

## 從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看清末洋務運動 失敗的原因

作者：夏玉泉

任何組織都需要一些制度輔助才能順利運作，洋務運動的結果是邁向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它需要商業、法律、政治方面相應之制度來輔助運行。然而中國自古並沒有產生這些制度，故注定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本文主要從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 自序

以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為文，本非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當動筆寫了第二章「洋務運動的展開」及第三章「中國經濟發展史」後，突然感到再難寫下去。原因是本文題目是從資本主義發展方向解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難處在於把洋務運動與資本主義連在一起。後來想到將現代化為切入點，由於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根據日本思想史學者黑住真的研究，認為現代化過程就是資本主義化過程，這樣洋務運動與資本主義便易於連在一起討論，後來下筆頗能得心應手。

本文的特色是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注入歷史學。首先，使用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實證主義（Positivism）經濟學方法論來分析洋務運動失敗原因。傳統歷史學者對歷史事件成因的分析，只著重個人之推理，得出的結論是否「正確」沒法驗證。實證方法採用理論來解釋歷史事件，從理論的限制下推導事件出現的相關條件（局限條件，Constraints），再以事實驗證局限條件。因此歷史的因果便能夠驗證，而且亦由此成為實證科學。

其次，使用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制度功能」理論，分析資本主義產生的制度條件。用經濟理論解釋歷史雖然並非筆者首創，經濟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 C. North）曾用制度變遷理論分析歐洲史經濟增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能廣泛利用經濟理論在歷史研究上，能使歷史分析更全面，結論更扎實。

這篇文章前後耗用了兩年多的寫作時間，原因是中途構想不出寫作的方向而停頓下來，俟再繼續寫時，已距離開始動筆一年多，期後只用了兩個月便將第一章前言，第四章洋務運動失敗原因，及第五章

總結完成。若不計算中途停頓的時間，通篇的實際寫作時間大約半年。

由於筆者學識所限，文內若有錯漏，讀者請不吝賜教!

夏玉泉

2022年11月22日

## 作者簡歷



夏玉泉，中學畢業後在某華資銀行的行政部及按揭部工作 40 年。擁有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管理文憑，澳門東亞大學(現為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及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現為澳門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工餘以研習經濟學為樂，對博弈論、公司治理及經濟史等課題頗具興趣。自 2003 年建立個人網頁“現實經濟學” (<http://economicsay.angelfire.com/>) 討論經濟問題，喜以經濟理論解釋社會現象。曾在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網上學術期刊“亞洲國際工商資訊”發表經濟文章 40 餘篇，當中多篇被轉載或被引用。

## 目 錄

自序.....	I
作者簡歷.....	III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 論.....	1
1.1. 晚清改革的動機.....	1
1.2. 現代化之定義及中國現代化的階段.....	2
1.3. 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	4
1.4. 中國現代化第二階段.....	4
1.5. 中國現代化第三階段.....	6
1.6. 中國現代化第四階段.....	7
1.7. 兩岸現代化的分途.....	10
1.8. 本文之結構.....	12
第二章 洋務運動的展開.....	14
2.1 洋務運動的背景.....	14
2.2 洋務運動的建設.....	16
2.2.1. 軍事工業.....	16
2.2.2. 改革軍隊.....	17
2.2.3. 海軍建設.....	17
2.2.4. 民用工業.....	18
2.2.5. 教育事業.....	19
2.2.6. 通訊事業.....	19
2.2.7. 鐵路建設.....	20
2.2.8. 金融事業.....	20
2.3. 洋務建設與資本主義之關係.....	21
2.4. 小結.....	24
第三章 中國經濟發展史.....	26
3.1 春秋戰國時期工商業及城市化發展.....	26
3.1.1. 鼓勵貿易.....	26
3.1.2. 低稅政策.....	27
3.1.3. 調控物價.....	27
3.2. 漢代的自由經濟思想.....	28
3.2.1. 盡人之性.....	29
3.2.2. 效法自然.....	30
3.2.3. 無為而治.....	30
3.2.4. 私有產權.....	30
3.2.5. 藏富於民.....	31
3.2.6. 自由競爭.....	31
3.3. 唐代蓬勃的國際貿易.....	32
3.4. 中國經濟的黃金時期宋代.....	34
3.4.1. 大城市普遍出現.....	34

3.4.2. 生產總值達世界高峯.....	34
3.4.3. 百姓生活質素提高.....	35
3.5. 洋人進入對明清經濟的衝擊.....	37
3.6. 中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原因.....	39
3.6.1. 中西政治制度的差異.....	40
3.6.2. 傳統中國經濟社會特點.....	41
3.7. 小結.....	45
第四章 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48
4.1 歷來對洋務運動失敗原因的分析.....	48
4.1.1 內容方面.....	49
4.1.2 財政方面.....	50
4.1.3 政治方面.....	50
4.1.4 國策方面.....	51
4.2 科學理論解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52
4.2.1 理論依據及提出假說.....	53
4.2.2 假說檢驗.....	55
4.3 中國的情況.....	61
4.4 小結.....	68
第五章 總結.....	69
5.1 本文分析方法的優劣.....	69
5.2 洋務運動失敗之商榷.....	70
5.3 中國現代化的展望.....	71
參考文獻.....	73

## 圖目錄

圖 1：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制度.....	22
圖 2：民主分權四大支柱.....	40
圖 3：資本主義制度綜合模型（夏氏綜合模型）.....	54

## 表目錄

表 1：兩宋與歐洲當時人均生產總值比較.....	35
表 2：兩宋進口商品分類表.....	36



# 第一章 緒 論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 J. Toynbee，1889-1975）在其十二巨冊的著作《歷史研究》中提出「挑戰與回應」理論，影響後世深遠。他認為任何民族、文化、組織與運動均有面對挑戰，陷入危機的時候。回應挑戰的方式直接決定危機的處理，因而產生不同的後果。湯因比認為大體有四種回應挑戰的方法：一、倒退回過往；二、對未來產生白日夢式的憧憬；三、封閉自己，以神秘經驗處理挑戰帶來的衝擊；四、面對危機，把危機轉化成有利於未來發展的元素。中國在清中葉以後，西方列強利用船堅炮利的優勢，掠奪中國經濟利益，當時國人對列強的侵略挑戰，不外有二：一、武力對抗，企圖將外力擊退；二、增強國力，平衡雙方之均勢。前者反映的是晚清以來之排外運動；後者則是一連串的改革運動。兩者均屬湯因比所說，以神秘經驗處理挑戰的方式，而這經驗卻是中國固有的天朝觀念。

## 1.1. 晚清改革的動機

中國自商周以來，華夏民族一直因文化上的優勢，鄙視華夏文明以外的夷狄（陶晉生，1988），因此傳統的中外關係是建基於「中國中心主義」和「中國人的優越感」之上，稱之為「中國的世界秩序」（約翰·費正清 J. K. Fairbank，1968）。十六世紀中西方接觸後，中國人仍然保持這種天朝觀念，因此鴉片戰爭（1840-1842）之失敗，中國輸的並非單純一場戰爭，而是整個觀念或夢想，當時的人仍心有不甘，排外活動因而接踵而來。及到英法聯軍之役（1857-1860），中國對外戰爭連番敗北，一些開明人士心感自身的積弱，遂油然而生變革思潮，因而展開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改革運動。其時的改

革仍不減天朝觀念，內容「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1861)為改革藍本，實質是「中學為主，西學為用」之變革理念。

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現代化改革之始。中國自古也曾出現變革，如：春秋時代管仲(725 BC-645 BC)相齊之改革；戰國時代秦孝公(382 BC-338 BC)的商鞅變法；西漢初年漢武帝(156 BC-87 BC)及西漢末年王莽(45 BC-23 BC)的經濟改革；以及北宋神宗(1048-1085)時的王安石變法。然而這些變法只針對單個目標：管仲變法著重富國；商鞅變法側重強兵；漢武及王莽變革重點在於經濟改革；王安石變法則兼備富國與強兵。現代化是一種根本上的(Fundamental)轉變(Change)，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甚至個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連浩鏐，2007)。因此與傳統中國的變法不能相提並論。

## 1.2. 現代化之定義及中國現代化的階段

學者對現代化有不同的理解，計有：一、以科學革命，增進人類智識，對傳統社會制度逐漸演化，以適應現代功能，並加強對環境控制的一種變遷過程(C. E. Black, 1966)；二、有鮮明特色的進程，不同生活習慣的人們都能感覺到其「一致的整體」(consistent whole)的現代性，其中包含「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傳播媒介的參與，不是雜亂無章和互不相關地出現的」(S. P. Huntington, 1968)；三、能夠用高度數字化管理之資本主義社會型態的國家(黃仁宇，1993)；四、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所發生的一種深刻變化，它既包括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明等方面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史過程及其變化，也包括各個國家和地區達到、

保持和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及其變化（何傳啟，2004）。無論如何定義現代化，它的結果總表現在三方面：一、經濟上，從傳統農業文明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二、政治上，從封建專制制度轉變為現代民主制度；三、文化上，從蒙昧群體主義轉變為自覺個體主義，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人格。

如前所述，近代中國現代化改革始自洋務運動，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相當漫長，並非一蹴而就，它至少經過了四個階段，而每階段有成功也有失敗，然而即使失敗了，某些現代化建設亦保留下來，跟下一次現代化變革的建設成為整個現代化的成果，從這個意義看，近代中國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從 1860 年算起至今仍然進行中。中國現代化的四個階段是：一、英法戰爭結束至中華民國成立前的一連串由上而下器物技能現代化，包括洋務運動、百日維新、清末新政；二、革命運動至中華民國成立後，民主制度的現代化；三、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以來思想、價值、行為的現代化；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大陸的兩次現代化範式轉變改革，包括 1957 年到 1978 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及 1978 年底以「改革開放」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歷程首三階段是湯因比式面對挑戰，陷入危機時所作之回應；第四階段的現代化改革是在政治及經濟俱極度低迷的時候，統治者不得不作改革力挽狂瀾而起，終卻導致邁進真正現代化之途，但成功與否現在還不能論定。若說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模仿西方科技之改革，應該沒有人異議。由於現代化社會以工業化為基調，故現代化最根本的內涵是工業化，而工業化則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礎上（連浩鏐，2007），因此 1860 年代以學習西方科技為主的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始。

### 1.3. 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

洋務運動、百日維新、清末新政都是中國現代化首階段的改革運動，皆在外力入侵下所作之反應：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清海軍不堪一擊，敗給「野蠻無文化」的西洋夷人，洋務運動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回應；甲午戰役清海軍又敗給自古傳承中國文化的日本，不但敵不過西洋，甚至東洋也不敵，唯有再作較徹底的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因政治原因不到百日終被全盤撤消，日、俄兩國在東北的角逐，導致列強在各地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險被瓜分之虞，同時民間排外氣氛熾熱，滿清舊勢力與民間排外力量結合，招致八國聯軍進佔北京，「辛丑和約」中國雖免被列強吞併，但條約的苛刻及賠款的數字都是歷來之冠，不但使經濟陷入谷底，清廷的統治威信也蕩然無存，清末憲政改革就是在這環境下的回應，也是滿清的一次垂死掙扎。這階段的現代化重點在學習西方物質及有形的東西，如：最初的船艦、槍炮，隨後擴及鐵路、開礦、電報、郵政等等，甲午之敗，知道只學習西方器物是不夠的，必須仿日本，也要學習西方倡民權的「立憲政體」及開民智的教育制度與學科，但對於政治改革仍限於空談。

### 1.4. 中國現代化第二階段

政體的現代化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以後的事。辛亥革命也是受到西方衝擊下的回應：清末一系列改革本是知識份子們希望藉此來增強國力，抵禦外侮，然而洋務及維新兩運動先後失敗，八國聯軍後清廷雖下詔制憲法、設國會、置諮議局，實行君主立憲政制，但經政府延宕推行的時間，人民漸對滿清政府完全失去信心，用革命替代改革來抵抗外力，成為國人心中改變國運的首選。當時以孫中山

為首的革命黨人所持的理念與改革派不同，從孫中山所創革命理論「三民主義」可見一斑，排滿興漢（莊政，1982），反清攘夷<sup>1</sup>（蕭一山，1967）是民族主義的精神；政治平等，世界大同（李旭飛，1986）是民權主義之所宗；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高力克，2011）是民生主義的目標。十八、九世紀歐洲出現了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三種思潮，「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揉合了中西思想，取長補短後而成。民族主義與西方國家主義頗類似，但它摒除國家主義的霸道與武力，用儒家王道觀以民族自決及民族結合為原則；民權主義集合了法國大革命時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及尚·盧梭（J. J. Rousseau，1712-1778）及查理·孟德斯鳩（C. L. Montesquieu，1689-1755）等人的自由和三權分立之說，但更強調人民主權與政府能力之分立（權能區分），達到民主與權威的平衡，此乃按中國傳統政治重政府職能的特點而為；民生主義採用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中道，主張經濟發展應走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的道路，這是傳統中國「為民制產」的經濟政策之延續。由此可見，這階段的現代化觀念融合了中西思想，較洋務運動以中學為體之改革確實為優。

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產生，結束二千餘年「朝代國家」，代之以「民族國家」，帶領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型態（金耀基，1983）。然革命力量尚薄，軍事上難與割據的軍閥抗衡，時在權力上有總統制與國會制之爭，卒為軍閥勢力以總統制劫持了革命成果，民主制度仍未落實。到北伐完成，軍閥剷除，1927至1937年的黃金十年，國民政府是奉行威權政治<sup>2</sup>和國家資本主義<sup>3</sup>的國家發

<sup>1</sup> 這裡的「夷」是指西方帝國主義者。

<sup>2</sup> 介於民主體制與極權政體兩個極端之間的一種政治體制，主要都是集中政治權力到一個單一的政治權威（政黨、軍方、或王室），多黨雖然形式上存在，但是都無法挑戰支配性政黨的權威；政治環境受到各種限制，因此並無公平的政黨競爭可言。

展模式（吳玉山，2012），不容許其他的政黨挑戰其壟斷性的政治權力，也強調要由國家引領中國的經濟發展。可惜的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始終未有實行真正民主的總統選舉或議會政制。

## 1.5. 中國現代化第三階段

如果說中國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是邁向經濟文明，第二階段是踏進政治文明，那麼第三階段應該是新文化的確立，當時稱為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特點是全盤接受西方文明，對中國所有傳統文化則予以否定，故有史家界定新文化運動的特徵是反傳統主義及激進主義（高力克，2009），也有論者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啟動近代中國時代轉型及思想啟蒙的一項重要運動（丘為君，2018）。整個新文化運動可分作兩個時期來說明，從 1895 至 1915 年，甲午戰後譚嗣同（1865-1898）在《仁學》中對儒家社會、家庭、個人道德規範在內的整個天理世界毫不留情地攻擊開始；到 1915 年陳獨秀（1879-1942）創辦《青年雜誌》及翌年更名為《新青年雜誌》是另一階段，《新青年雜誌》，以「改造青年的思想，輔導青年的修養」為宗旨，提出：中國社會的改造，應建基於國民（尤其是青年）的人格、素質和價值觀念的更生，雜誌對學生及年青知識份子的感染力非常巨大；1919 年五四學生運動之發生，可以講是由這些思想鼓動青年對時局及國家的關注而導致，最後反使這種新思想席捲全國，推動新文化運動發展至巔峰。

新文化運動仍離不開受外力入侵回應對外來挑戰之模式，加上以中國文化為本來模仿西方之洋務改革失敗後，大部分國人已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前述譚嗣同對儒家的攻擊便是一例；民初共和政

---

<sup>3</sup> 介於市場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兩個極端之間的一種經濟制度，基本上生產工具是私有的，但是在所有人運用資產時，會面對國家所設定的各種誘因和限制，以調控和引導產業發展的方向。

體有名無實，兼且軍閥們推崇儒學不遺餘力，在此等環境下，對人們何以接受全盤西化及出現反傳統的思想應不會懷疑。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的觀念如部分學者所指是受到激進主義之影響，只要屬於西文化，全都無條件及盲目地接受，如民主與科學，及後來的共產主義，重要的是為了反對專制和迷信落後，運動的矛頭直指儒家學說，激進者甚至喊出「打倒孔家店」之類的口號。五四新文化運動因此產生了三大思想流派：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及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sup>4</sup>。

新文化運動的成效彰顯，新思想雖然未必能在經濟與政治造成即時的效應，但在社會生活上卻產生了立竿見影之效。反傳統主義使儒學在中國社會受到排斥，傳統社會觀念遂被打破，例如女性的地位不斷提升、婚姻禮俗的變遷、慈幼養老觀念的更新、求子風習及生育觀之改變；而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轉變了不少，汽車代替了坐轎、洋服代替了華服、西洋食品代替了中式食品、洋房代替了平房，雖然早期這些轉變只限於上流社會中，但隨著消費量增加，價格下降，後來連一般百姓也漸能享用。

## 1.6. 中國現代化第四階段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國隨即進入國共內戰，1949 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其時中國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八年抗戰已經摧毀了很多工業設施，戰爭期間生產停頓，戰後資本短缺，企業沒法再次建立起來；內戰後新政權雖有整頓經濟之心，但共產黨向以階級鬥爭為綱領，建政後出現多場政治鬥爭，使經濟建設計劃受阻，後來的「文

---

<sup>4</sup> 又稱新儒家/學（**Neo-Confucianism**），主要是抗衡當時極端的反儒思想，它將儒學重新包裝，突出其現代意義，並確立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法。代表人物是梁漱溟（1893-1988）。

化大革命」更將中國經濟、文化摧殘得體無完膚。戰爭及內亂破壞了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改革，使中國倒退接近數十年。1978 年在中共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的主持下，推行改革開放，中國現代化發展又再重新出發。

這階段的現代化可分為兩部分，首部分是從 1958 至 1960 年，第二部分是從 1978 年到現在。當中共取得政權時，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並不良好，由於毛澤東（1893-1976）以共產理論奪取政權，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跟共產老大哥蘇聯出現冷戰（Cold War），西方國家為了堵截蘇聯所扶持的共產國家之滲透，中共受到各國的孤立。為了改革國內經濟，中共建政初期經常接受蘇聯的援助，但自 1956 年中共對蘇聯「去史太林化」政策的不滿而決裂，中共只可孤軍作戰。

1949 年後中共並沒有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建設，在前過渡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經濟方面允許私有制存在，政治方面由四個階級組成聯合政府<sup>5</sup>，因此從 1949 到 1953 年，中國的經濟有很好的發展，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24.45%。1954 年開始實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時期的主要目標是使中國成為工業化國家，及消滅私有制，確立公有制。1958 年在缺少蘇聯援助及由毛澤東的推動下，社會主義建設瞬間上馬，當時稱為「大躍進」運動，目標是：一、高速發展經濟；二、達到自力更生；三、消滅「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在工業方面主張「五並舉」：即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土法生產（中間技術 intermediate technology）與洋法生產（先進技術 advanced technology）同時並舉。在農業方面，廣泛推動農業生產合作社，其特點是「一大二公」，即「大」型及「公有化」程度高的組

<sup>5</sup> 四個階級是工、農、小資產階級（小商販、知識分子、手工業者等）及民族資產階級。



織、1957 年秋收後實施大規模興築水利工程運動、1958 年下半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深翻和改良土壤運動。不幸是從 1958 到 1960 年的「大躍進」運動，由於實行不得其法，一切建設操之過急，地方又虛報生產數量，釀成全國大飢荒，1960 到 1962 年間有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人死亡。總體而言「大躍進」並非一般的現代化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並藉群眾力量及「階級鬥爭」手段來實行現代化之目標。

隨著「大躍進」的失敗，上層政治鬥爭越演越烈，1966 至 1976 年達到巔峰，造成中國現代史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後社會經濟凋零，政府缺乏資金，生產及消費低迷，百姓生活艱苦。當時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模式，特徵是：一、中央計劃商品的生產與分配；二、沒有民營企業，國營企業成為經濟主體；三、商品價格由政府決定，市場制度不再出現。在浩劫後貧困情況壓迫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只有改革不可，第四階段現代化的次部分旋即展開。鄧的改革重點在經濟方面，方法是改經濟運作為市場經濟及引進外來投資，通稱「改革開放」，藉以搞活經濟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革開放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引入利潤誘因激勵生產活動。農村改革方面有二：一、將生產合作社的指令經濟轉化為以「承包制」(contracting out system)<sup>6</sup>為基礎的經濟；二、農村副業的復興與鄉鎮企業的出現。從 1979 到 1984 年，農業總產量增加了 50%。在同一時期，糧食生產的年均增長率達 4.80%。企業方面之改革，1979 至 1980 年間創立了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市四個經濟特區，目的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

<sup>6</sup> 國家把土地劃分給農民經營耕種，雙方協定一個生產指標，若產量超過協定指標，則超標部分的農作物歸農民所有，從而達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之結果。

及發展對外貿易；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採取「放權讓利」<sup>7</sup>制度，引進現代企業的經營方式；容許私人開辦企業，增強企業的競爭環境，1990年代初，大規模地出售國有企業，「國（企）退民（企）進」之勢一時成為佳話。整個改革開放使中國人均國民所得從1978年的379元增至2003年的8,469元，1979至1990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9.70%；1991-1994年為11%；1995年以後為7%。上述數字充分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卓越成就。

## 1.7. 兩岸現代化的分途

若問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代化有何成果？答案應該是得多於失。中國從一個與外界隔絕，相對落後及自給自足的國家，演變成今天在國際上舉足輕重，國民所得位列世界第二位，西方文化，如飲食、衣著、生活等在中國廣被接受的國家。但是這些轉變尚嫌不足，一個現代化國家除了經濟富強外，政治的民主化，法治的公正及社會的平等都是很重要的。當然清末以來無論在民主，法治及平等各方面已有改善：君主專制制度取締了，法院及律師制度替代了官僚審判制度，男女地位平等亦得到認同，但這還是有不足之處。首先，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民主仍有差距，主要是各項選舉並非全民票選；其次，法律並非獨立於行政，因此法治無法達到公正；再者，階級觀念仍重，尤以官僚方面，社會難有真正的平等。

中共建政後七十多年間，中國從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走進極端社會主義，由此摧毀了過去現代化的成果，幸而後來之改革開放，中國重新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令國家富裕起來，但經濟改革的背後，仍

---

<sup>7</sup> 企業在完成國家生產計劃後，可按市場需求，增加生產，自行定價銷售，並保留部分利潤。此舉能擴大企業自主性，提高生產力。

須要有政治改革以資相輔。內地學者張維迎認為，改革開放分為兩部分，前部分是經濟改革，後部分是政治改革；若以 1980 年作為改革之起點，前三十年 1980 至 2010 年是經濟改革，後三十年 2010 至 2040 年是政治改革，當整個改革完成後，恰好是中國門戶被武力開啟的鴉片戰爭二百年<sup>8</sup>。

遺憾是經濟方面，2008 年後中國出現了「國（企）進民（企）退」的倒退現象，大量貸款給予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強迫性收購民營企業，加上政府濫用經濟調控政策干預市場運作，似是朝計劃經濟的回頭路走；政治方面，2018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結束國家主席兩屆任期的限制，這意味回歸領導終生制度，從這個意義看，政治改革不但裹足不前，而且出現極大之倒退，距民主制度又後退了一大步。

反觀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1950 年代開始發展經濟，初期政策上仍帶濃厚的國家資本主義色彩，如限制外國貨品入口，保護國內工業；後來改行經濟自由化<sup>9</sup>，期間實行三大政策：一、發展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二、從調整行政，司法，教育等制度出發改善投資環境；三、尊重市場機能的運作，減少行政干預，最終台灣於 1970 年代，躍升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77 至 1985 年間平均經濟年增長率達 7.91%。自始中華民國擺脫了 1930 年代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邁進市場資本主義年代。1949 年的民國政府延續了現代化威權的政治體制，一方面實行「動員戡亂」的軍事狀態，控制百姓的言論及自由；一方面維持一黨專政。直至 1987 年解除戒嚴令及開放黨禁，民主步伐加速；1996 年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的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及副

<sup>8</sup> 見張維迎著「把脈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革」載於《市場的邏輯》，2012 年增訂版，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P.384 及 P.386-387。

<sup>9</sup> 1973 至 1990 年是台灣經濟自由化時期。

總統，完成了民主憲政之路；2000 及 2008 年更分別出現兩次政黨輪替，自此在台灣的中國人不但享受到自由民主的政體，而且在社會與世界先進國家完全接軌下，成為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中國人。

## 1.8. 本文之結構

洋務運動既是近代中國現代化改革之始，在歷史上有雙重意義：一是中國首次接受西方事物；二是從此形成中、西文化衝突及融合之現象。這些現象分別出現於不同的中國社會，例如在中國內地，衝突多於融合，在香港及澳門等殖民地城市，融合多於衝突。由於洋務運動在文化衝突下失敗，打擊了推動運動的士大夫的心，幸虧後來仍出現多次現代化改革，每次改革雖有失但亦有得，這些得著累積起來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成果。本文將對洋務運動失敗作一分析，重點放在制度與組織之關係上。任何組織都需要一些制度輔助才能順利運作，洋務運動的結果是邁向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是透過市場對資源使用及分配的一種組織，我們接受歷史學者黃仁宇的觀點，認同資本主義的三大條件是：通過貸款方式活用資金及資本，使資金廣泛流通；存在龐大的企業，產生職業經理人；及一切社會配套使企業活動的範圍超過企業所能及的界限。因此在商業、法律、政治方面必須有相應之制度來輔助資本主義的運行，然而中國自古並沒有產生這些制度，故注定了洋務運動失敗。本文主要從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本文的結構除本章緒論外，第二章對洋務運動作一鳥瞰式描述，第一節對洋務運動背景作一詳細敘述，第二節列舉所有洋務運動推行的建設，第三節指出這些建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第四節是小結。第

三章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第一節說明中國在春秋時期工商業及城市已經充分發展，並指出當時有利於工商業發展及城市興起的條件，第二節解說漢代自由經濟思想是商業發展之延續，並對當時的自由思想作一分析，第三及第四節分別敘述唐、宋兩代經濟的繁盛情況，第五節敘述明、清兩代中國與西洋接觸後的情況，第六節分析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第七節是小結。第四章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第一節是簡述歷史上對洋務運動失敗原因的分析，第二節從科學方法重新對洋務運動失敗進行分析，首先確立理論根據並提出假說，然後利用英國在十六至十九世紀史實驗證假說，第三節根據洋務運動前中國所處的環境及既有的制度，指出在我們的假說條件下，洋務運動乃注定失敗，第四節是小結。第五章是本文之總結。

## 第二章 洋務運動的展開

1861年清廷設置中國首個外交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負責掌管對外事務，後來成為推動洋務建設的主要機構。意味著全國規模之西方工業運動立即啟動。

### 2.1 洋務運動的背景

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各國早經英國工業革命，接受了先進生產技術，繼而擴大了國內經濟，當國內產能過剩需要擴展市場，各國便靠「船堅砲利」向外發拙。這種擴建「殖民地」來發展工業經濟為基礎的「帝國主義」，跟十六、七世紀以殖民為目的之「帝國主義」實不相同，故稱之為「新帝國主義」（王曾才，1979）。

中國於十六、七世紀與西方國家已有接觸，當時前來中國的是傳教士，他們將西洋物品及學術帶來中國。當然也有因通商為目的者，故葡萄牙於1557年佔領澳門，荷蘭於1627年佔據台灣等事件，此等是歐洲國家在遠東建立貿易據點的實況。

由於前來的傳教士都尊重中國傳統禮法，不但穿華服、蓄華髮，而且學習中國文化，所以一些中國人都接受了所傳宗教，包括明廷大臣徐光啟及楊光先，彼等對西洋科學津津樂道。對於通商事宜，明、清兩代執政者都礙於「自大」心理，對西方要求每都敷衍推搪了事。

英國早於十八世紀首先實行工業革命之國家，因此亦是最早發展「新帝國主義」的歐洲國家。1792年英國政府任命馬甘尼（G. Macartney, 1737-1806）為大使，率領使團並攜備貢品十九件從廣州乘船到天津，以賀乾隆（1711-1799）八十大壽為名向中國提出改善貿易建議。可惜當時中國仍以「天朝」自居，對英國所提出的各項要

求，僅用「與天朝體制不合」為理由加以拒絕（李定一，1974）。

隨著馬甘尼使華之目的失敗後，英國人在中國貿易，期間又出現因文化差異而導致的一連串衝突，中英兩國開始出現矛盾，之後兩國歷次戰爭中，中國每都敗給這個「大紅毛國」。先是 1842 年的「鴉片戰爭」繼是 1856 年「英法聯軍之役」。「鴉片戰爭」失敗，清廷不單開放五個港口供外國商船停泊及通商之所，歐洲各國相繼仿效向清廷提出通商要求，更甚者因外力入侵，使國人對外人的態度，從仇外、到排外、再到媚外的不正常心態；「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英法兩軍攻陷北京，洗劫圓明園及放火焚毀。此等喪權辱國事情，逐漸驅使清廷有識者不得不作自我檢討。

十九世紀前的六十年，中國在滿清統治下，對外昧於國際新形勢發展，仍以「蠻夷」對待外來的西方國家；對內則「團關自守」，視貿易為給予外國之恩惠，實不明自由貿易對雙方有利之道理。基此，這六十年間，清廷與西方國家關係無一不在分歧、衝突、與戰爭的過程中發展，而每次都飽嚙失敗的結果。慶幸是清廷吸收了歷次戰敗的經驗，知道西方列強致勝之器——「船堅砲利」，背後憑藉的是技術創新。

1850 年在廣西金田川（今廣西桂平市金田鎮），洪秀全（1814-1864）及楊秀清（1823-1856）等人，以太平天國之名發動「抗清戰爭」，太平軍初時勢如破竹，很快佔據了江寧府城（今江蘇省南京市），勢力範圍遍及十八省，終被清廷剿滅。然而太平天國革命助長了漢人勢力的抬頭，原因是平定洪、楊革命的軍隊——湘軍及淮軍——分別由漢人曾國藩及李鴻章主理。

憑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獲得了政治高位的漢人，擁有拯救中國的抱負。從太平軍要毀滅中華文化，他們「投袂而起」（李定一，1974），

及西方勢力入侵，促使他們高度警惕便可以一斑。當他們對西洋輪船行駛之速、洋砲發射之遠都印象深刻，莫不想效法其技，欲反以之克制洋人；時滿洲親貴在「英法聯軍之役」入北京，親身感受到西方武力加諸的刺激，恍然大悟，覺得非改革未能與之匹敵。一場學習西洋文明的改革運動，在同治年間（1862-1875）旋即展開。

## 2.2 洋務運動的建設

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展軍備、興實業、重基建是它的主要建設內容。唯因這些改革不夠徹底，致甲午中日戰敗後，清廷上下對該運動已心灰意冷，最後失敗告終。茲將從 1862 年至 1875 年間洋務運動的建設列舉於下，以作失敗之分析。

### 2.2.1. 軍事工業

- A. 安慶內軍械所（1861 年，安徽安慶，曾國藩），製造子彈、火藥、槍炮、輪船。
- B. 天津機器製造局（1867 年，天津，崇厚），基本是煉鋼，以製造火藥、槍炮、子彈、水雷，布置水雷用的輪船和挖河船為主。
- C. 江南製造總局（1865 年，上海，李鴻章），軍事生產機構，為後來江南造船廠的前身。
- D. 漢陽兵工廠（1890 年，湖北漢陽，張之洞），製造及設備步槍、引進煉鋼與火炮製造設備。
- E. 金陵機器製造局（1865 年，南京，李鴻章）。
- F. 福州船政局（1866 年，福州，左宗棠、沈葆楨），設有鐵廠、馬尾造船廠和船政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 G. 西安機器局（1869 年，西安，左宗棠），生產彈藥。



### 2.2.2. 改革軍隊

- A. 1861 年奕訢明確奏請購外國船炮。
- B. 姚瑩向俘獲的「黑夷目」詰以造船炮之法。
- C. 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當推 1862 年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率淮軍從安徽來到上海，一與外國軍隊接觸，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推崇洋人的「戰守攻具，天下無敵」。
- D. 據統計：1864 年淮軍使用洋槍佔全軍 80% 以上，到 1865 年，五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基本上做到「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淮軍於 1864 年且另設有洋炮隊四營。湘軍「每營五百人僅用抬槍小槍一百二十餘杆」，「每營則用洋槍四百餘，少亦三百餘杆」。

### 2.2.3. 海軍建設

- A. 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國採購軍事裝備，並成立了四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與福建水師。
- B. 北洋水師於 1888 年在山東威海衛劉公島成立，是清朝新式海軍四支艦隊中規模最大、投資最巨者，規模一度為世界第八、亞洲第一。
- C. 南洋水師於 1875 年由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建立。至 1884 年，中法戰爭前已經頗有規模，有巡洋艦及炮艦等十七艘，約二萬噸。1884 年中法戰爭中，南洋艦隊失去兩艦，又因為意外沉沒了一艦。由於清廷的政策是先行集中力量發展北洋水師，故此南洋水師無論是噸位、裝備、人員及實力皆與之相差甚遠。
- D. 1866-1868 年，時任兩廣總督瑞麟向英國及法國購入了六艘蒸汽火炮艦船，用於巡海、緝私及捕盜，1875 年後納入清朝新式海軍——廣東水師。

E. 1866 年福建地方官員向英、法、德、美等國採購及製造小型戰艦用作巡洋緝私；後成立福建水師，負責守衛福建、台灣周邊海域。它由福州船政局規劃、駐防福建沿海。

#### 2.2.4. 民用工業

A. 開平礦務局（1878 年，開平鎮，唐廷樞），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商集股，每股面額一百兩銀，發行八千股，募得資金八十萬兩。

開平礦務局的建設：

I. 唐胥鐵路（唐山開平—胥各莊）是中國第一條標準軌距的鐵路。

II. 「龍」號機車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輛蒸汽機車。

III. 1881 年開始產煤，當年產煤 3613 噸，1882 年產量增加到 38,383 噸，1883 年產煤 75,317 噸，1884 年產煤 179,225 噸，1885 年達到 241,385 噸，連續五年共產煤 538,123 噸。截至 1899 年共產煤五百二十七萬多噸，盈利四百多萬兩。

B. 基隆煤礦（1876 年，台灣基隆，沈葆楨），第一座官礦，引進新式的採礦設備，開鑿深九十公尺，直徑約四公尺的直井。但由於開採技術、礦場管理、和運輸等技術沒有繼續進步，1879 年官礦產量減少，1884 年中法戰爭爆發，當時台灣的巡撫劉銘傳下令炸毀官礦，燒棄存煤 15500 噸。

C. 漢陽鐵廠（1893 年，湖北龜山，張之洞），創辦經費最初定為 246 萬餘兩，1892 年清政府增撥四十二萬兩，到建成時，實際支出五百萬兩左右。

D. 蘭州製造局（1872 年，甘肅蘭州，左宗棠），原為左宗棠在 1867 年籌建，並 1869 年於西安建立的西安機器局，生產彈藥。1872 年遷

往蘭州，為西北最早的現代工業企業。後改為蘭州通用機器廠。

E. 輪船招商局（1873 年，上海，李鴻章），以官督商辦模式創辦的航運企業，也是中國最早以現代公司概念經營的企業之一。招商局成立後，

F. 機器織布局（1878 年，上海，彭汝琮），為中國第一家機器棉紡織工廠，1890 年，開始投產。投產後，織布局營業興旺，由於事先請李鴻章上奏，織布局獲得稅收優惠，利潤率高。1893 年織布機發生大火。同年 11 月，李鴻章命盛宣懷和上海道聶緝槩負責恢復，招徠股金一百萬兩，在舊址重新設立「華盛紡織總廠」，在上海、寧波、鎮江等地設立十個分廠。

### 2.2.5. 教育事業

A. 全國修建三十餘所近代新式學校，用來培養科學、軍事、翻譯人才。

B. 1862 年於北京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及培養翻譯人才的廣方言館。

C. 1872 年至 1875 年間每年向美國派遣三十名幼童留學。

D. 福州船政學堂（1866 年，福建福州馬尾港，沈葆楨），專為福建船政培訓人材而設。學堂成立之初即聘用外國教習教授造船、航海等專業知識。

E. 北洋水師學堂（1881 年，天津，李鴻章）

F. 天津電報學堂（1878 年，天津，李鴻章），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工業技術學校亦是中國最早的電報學校。

### 2.2.6. 通訊事業

A. 1879 年於天津和大沽之間鋪設長約六十公里的中國第一條電報線路。

- B. 之後，又在天津東機器局和直隸總督衙門之間架設了一條長達六點五公里的電報線。
- C. 1881 年開設電報總局，並鋪設由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
- D. 1882 年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募集股本八萬兩，當年繳還官本六萬兩，五年後分年繳還二萬兩，其餘墊款則以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省督撫及出使大臣有關公務的電報作為頭等官報，從應受電報費中陸續抵繳，抵還完畢後，頭等官報依然不收費，以盡商人報效。
- E. 1884 年上海至廣東的電報路線竣工。電報總局由天津遷往上海。
- F. 1885 年電報路線達至漢口。

### 2.2.7. 鐵路建設

- A. 唐山至胥各莊鐵路（1881 年，河北省唐山市），是中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建成伊始只准用騾、馬曳引車輛，次年才改用機車牽引。
- B. 1887 年海軍衙門總理醇親王奕譞奏准把唐胥鐵路向東再延伸至山海關，1888 年向西延伸至天津。
- C. 最早計劃修建鐵路的地方在京、滬。早在 1862 年就有怡和等英美洋行建議修築蘇州至上海的鐵路，被拒。1865 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門外修建了一條一里多長的鐵路，但旋即就被步軍統領衙門拆掉。1880 年，怡和洋行修建了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終因沿途百姓反對及壓死一個士兵而被拆毀投入海中。不過這兩處初擬修築的鐵路多由外資興建，只有唐山至胥各莊路才是中國自建。

### 2.2.8. 金融事業

- A. 仁和水險公司（1876 年）
- B. 濟和水火險（1878 年）

## 2.3. 洋務建設與資本主義之關係

1763 年英國人瓦特 (J. Watt, 1736-1819) 改良了紐科門蒸汽機 (Newcomen Steam Engine), 奠定了工業革命的重要基礎。瓦特蒸汽機被廣泛應用後, 紡織、煤鐵、運輸、及水運等行業全面自動化, 而且自動化技術遍傳歐洲各國。不但如此, 伴隨工業自動化的是電報、電話等通訊業及銀行、證券交易所等金融業蓬勃發展, 工業革命改變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及經濟模式。

工業革命使歐洲大部分國家, 從傳統農業國走向資本化工業國, 霎時間整個歐洲富裕起來。與此同時, 十八世紀歐洲經濟學家史密斯 (A. Smith, 1723-1790) 提倡自由經濟思想, 反對政府干預, 對當時工業化發展有錦上添花之效, 因為眾多的新發明、新建設, 只有在自由競爭環境下才有可能實現。經濟學者稱十八、九世紀由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是資本主義 (Capitalism) 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有如下的經濟現象：一、普及化自動生產；二、大型企業湧現；三、金融資本化興起；四、基礎建設不斷出現；五、管理技巧推陳出新, 而且這是基於其因果關係而導致的一連串自然結果。首先是新技術發明改變了生產方式, 大批量生產成為可能；然後工廠規模日漸龐大；大型工廠的融資金額大, 因此需要借助各種金融工具用作籌募資本；大批量產品需要先進的設施協助運輸, 發展鐵路當可滿足企業需求；大型工廠的運作必須具才能的管理者負責, 故擁有專業管理技巧的管理者出現。

資本主義制度具有下述三項條件：一、通過私人貸款方式, 活用資金及剩餘資本, 使資金廣泛流通；二、由於企業龐大, 超過企業主本人所能監視的程度, 所以企業以僱用方式聘請經理；三、必須擁有

公司使用的設備，例如交通通訊，使企業活動的範圍超過企業所能及的界限（黃仁宇，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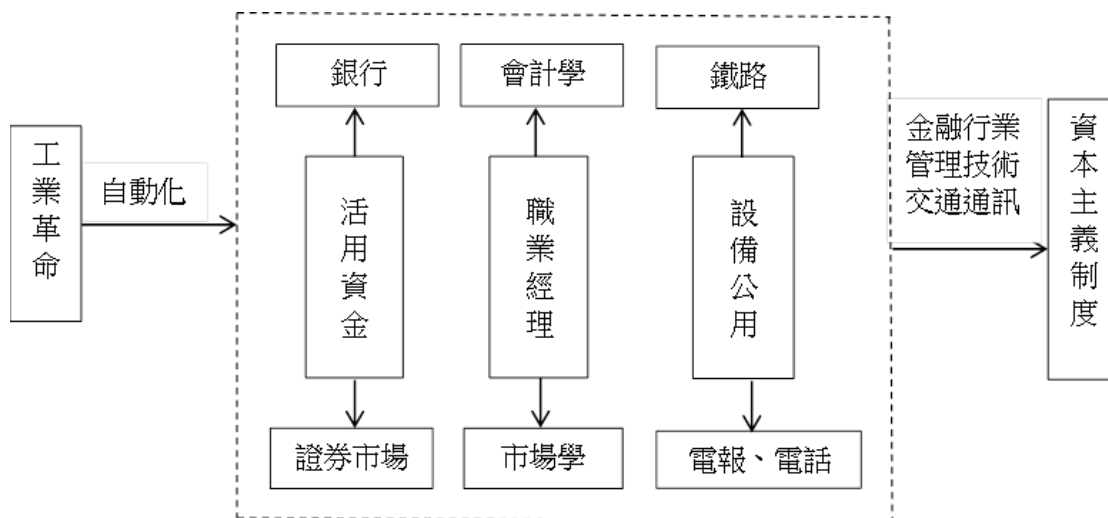


圖 1：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制度

圖 1 是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工業革命的自動化使大型企業出現，屬於經濟發展之硬件。大型企業的特點是：一、活用資金；二、經理人聘請制度；三、公用設施。有硬件就需要相應的軟件輔助不可，金融業、管理技術及交通通訊等便應運而生，最後形成完善的資本主義經濟。

從歷史之發展得知，資本主義制度是由工業革命所導致，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歷史足可引證：當技術升級以後自動化開始出現，自動化能夠增加生產效率，其本身亦是一種商業機會，進而推進了工業革命的發生，這時金融、管理及基建（統稱金融基礎制度）等輔助軟件也相繼產生，金融基礎制度的湧現又會提高工業革命的程度，如此循環往返，最後形成資本主義經濟型態。

因此金融基礎制度是否齊備，對資本主義的確立重大影響；反過來，假如推動工業革命發展的金融基礎建設未能有效確立，原先的自動化便要摧毀，工業革命不會成功，資本主義經濟也不能產生。所以

金融基礎建設，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經濟三者有著因果關係，而且金融基礎制度與工業革命更互為影響。

除此以外，民主政治對資本主義發展也有幫助。英國早在 1215 年頒布「大憲章」，其有兩大意義：一、以法律限制英國王室的絕對權力；二、法律必須凌駕所有人之上，無論王室政府或國民都需要遵守。1688 年「光榮革命」的「權利法案」通過確認議會對王室的優先地位。這些政治及法律制度對英國在十八世紀推動工業革命，實施有效的金融基礎制度幫助很大。

我們將中國在同治年間推行的洋務運動看作一場工業革命，不妨稱之為模仿型工業革命，模仿的是西洋船堅砲利，它跟十八世紀歐洲工業革命相同之處，都是一場自動化改革。根據歐洲當時工業革命發展的經驗，期間會出現許多金融基礎制度，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組織。

工業建設及軍隊變革是洋務運動的部分內容，軍隊現代化需要很多先進裝備，所以軍事工業不可或缺，民用工業及軍事工業成為洋務運動發展的骨幹。教育、鐵路、通訊、及金融等，可視作輔助洋務運動的基礎建設。假如洋務運動成功，中國必然走向如歐洲工業革命後之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但一切有利於發展金融基礎建設的制度是否齊備，又與工業革命發展是否順利有關。

有人認為，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是這些基礎建設未夠齊備所致，我想此等批評只能解釋部分原因，始終未能解釋何以基礎建設不足。只有針對影響環境之核心變數才能有清晰的解釋，這些環境的核心變數，是民主政治，自由主義，及社會思潮，它能推動金融基礎建設發展，也是引導邁向資本主義經濟路徑的力量。深入分析影響環境之核心變數，能夠對洋務運動失敗有一明確的了解。

## 2.4. 小結

1861 年清廷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意味洋務運動正式開始。這場運動在十九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及新帝國主義的衝擊下成長，當時西方的科技先進，利用「船堅砲利」力圖開啟中國通商之門。十六、七世紀時前來中國的傳教士，由於尊重中國禮儀，及學習中國文化，因此東、西初次接觸能夠在融洽氣氛下順利進行；然而當十八世紀英國要求中國加開通商口岸時，滿清政府以「天朝」身份斷然拒絕。馬甘尼使華失敗後，中、英兩國不斷產生商務糾紛，1842 年鴉片戰爭終令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後來英法聯軍之役北京被攻陷，聯軍焚毀圓明園並大肆劫掠。如此喪權辱國下，促使有識之士作自我檢討之心。

1850 年在廣西發起「太平天國」的抗清戰爭，其勢力遍及十八省，終被剿滅，但漢人勢力因此抬頭，他們深感西洋科技之優良，而滿州親貴在英法聯軍佔據北京時，目睹西方武器之精巧，都覺得不改革實難與之匹敵。洋務運動於是展開。洋務運動的建設內容涉及多方面，包括：軍事工業、改革軍隊、海軍建設、工業建設、教育改革、通訊事業、鐵路建設、金融事業等。

1763 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機，接著一系列自動化技術在歐洲擴展開來，因而奠定工業革命之基礎。工業革命使歐洲各國成為資本化工業國，加上在當時的自由經濟思想火上加油，十八、九世紀時，資本主義制度席捲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是自動化、大企業化、金融資本化、基建不斷湧現及管理技巧推陳出新。它所具備的條件包括：資金廣泛流通、職業經理人出現、企業活動超出本身能及的界限。

資本主義乃因工業革命所導致，而工業革命又需依賴金融、管理及基建等軟件輔助才能發展，這些金融基礎制度對資本主義的確立有



重要影響。金融基礎建設，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經濟三者有著因果關係，而且金融基礎制度與工業革命更互為影響。政治的民主對資本主義也有一定關係，英國的經驗表明，由於 1215 年頒布了「大憲章」及 1688 年發生「光榮革命」，王權受到議會制衡，對實施有效的基礎制度有很大幫助。

若將洋務運動看成一場模仿西洋船堅砲利的工業革命，假如在變革之同時，金融基礎制度也得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會因而出現。洋務運動中的建設如：工業及軍事工業、教育、鐵路、通訊、金融等都是基礎建設，這些建設對中國工業革命的進行有重要影響，因為它們主宰著中國是否走上資本主義之路。

雖然有認為基礎建設不齊備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但這只是部分原因，何以基礎建設未能齊備才是重要。社會環境是影響基礎建設發展的根本，對民主政治，自由主義，及社會思潮等影響環境之核心變數作深入分析，才可對洋務運動失敗有一明確的了解。

## 第三章 中國經濟發展史

如工業革命般的大型經濟變革，必須有完備的基礎建設輔助才得以成功。這些建設有兩項重點：一、它除了幫助經濟改革成功外，還需要具有利於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性；二、要確立基礎建設的前提，是該國家或地區需要有自由的政治及經濟制度配合。本章將從春秋戰國至清初的經濟發展，說明洋務運動前中國的經濟制度。雖然中國傳統是自由主義及市場導向的經濟，但資本主義始終沒法在社會植根，這裡會探討其箇中原因，從而啟發我們思考洋務運動失敗的關鍵。

### 3.1 春秋戰國時期工商業及城市化發展

中國雖是以農立國，然而工商業活動在中國的起步時間卻很早。春秋戰國時期（722 BC-222 BC）中國的工商事業已經崛起，其後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大城市亦相繼發展起來，普遍出現於諸侯國的都邑。如齊國的臨淄、燕國的薊、趙國的邯鄲及秦國的咸陽都是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最早提出將商業活動為國策的諸侯國是桓公（？-222 BC）主政下的齊國，當時齊桓公任用管仲（723 BC-645 BC）為相執行變法，管仲制定與商業有關之改革項目包括<sup>10</sup>：

#### 3.1.1. 鼓勵貿易

開放漁業及煮鹽業出口；為對前來齊國營商的人表示歡迎，政府不徵收任何稅款；並在國內每三十里處設立專門招待外商的客舍，還提供他們膳食、馬的飼料及供給人員為其調遣。

<sup>10</sup>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吳曉波著。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2月初版，P.20-22

### 3.1.2. 低稅政策

對所有商品實行單一稅制，即商品只在關隘或市場中徵稅一次，若在關隘徵了稅，在市場上就不再徵收，反之亦然。

### 3.1.3. 調控物價

用不同的方法來控制商品價格，如果外國貨品品質高於本國，便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售價，以控制外國商品輸入；如果要鼓勵出口，就要壓低售價。

雖然管仲變法所出現的營商機構都是國營組織，但他的重商理念卻被當時諸侯廣泛接受。其中主張與諸侯國進行商業貿易，從而控制其商品來源，提高政治上更多話語權之「以商止戰」策略，不但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首位出現之霸主；而且管仲推行的貿易政策，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的自由貿易政策，它使齊國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商人活躍導致齊國都城臨淄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城市，居民人數多達三十萬（吳曉波，2014）。自此其它諸侯都爭相仿效，不干預國內的商業活動，百姓亦開始經營工商事業。孔子學生子貢可以稱得上是商人的鼻祖，他因出售土產而賺了錢（葉龍，2013）。到了戰國「任俠之風」<sup>11</sup>盛行，戰國四公子<sup>12</sup>有能力供養門下眾多食客，原因彼此都是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

商業活動必須選定在一個地域內進行，為了方便進行交易，人們會聚居在城市裡，然後該城市的人口便增加，結果逐漸產生了商業城市。城市人口增加後，住的需求也隨而增加；貨物流動需要運輸及倉儲，因此物流業也興旺起來；外地前來貿易的商人，食與住是必然的

<sup>11</sup> 戰國時期諸侯公卿等貴族為招攬賢士而收留很多人在其門下，負責他們日常的食宿，稱為「養士」。「俠」在漢朝才出現，俠是收留一些亡命天涯之人。「任俠」是借用該詞，指無償地收留有賢之人作為日後之用。

<sup>12</sup> 戰國四公子是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及信陵君。

需要，旅館及食肆需求亦不會短缺；假如外地商人逗留時間較長，適當的娛樂就在所難免。結論是城市之出現帶動其它行業發展，於是拉動了蓬勃的經濟。當時的一個現象是如果諸侯國內有較多大城市，該國的經濟必然獨佔鰲頭。

城市化對日後工商業發展有深遠之影響。中國歷代都曾有君主推行「抑商政策」<sup>13</sup>，其時工商活動雖然備受打擊甚至停頓；但當繼任者重推「重商政策」時，工商業就可立刻再次蓬勃。原因是城市內的物流設施、旅館及食肆等基建並沒有被摧毀，它對加速工業成長有正面的推動作用。

### 3.2. 漢代的自由經濟思想

眾所周知，自由市場制度是經濟繁榮的催化劑。西漢(202 BC-8 BC)時司馬遷(135 BC-90 BC)繼承了儒家思想關於法乎自然、順乎人性及無為之治的自由市場理念，並竭力發揚光大。太史公對經濟政策就有如下論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司馬遷認為最理想的經濟政策，是政府不要干預私人商業活動，應由市場引導他們作商業決策，即政府採取無為之法的放任政策；至於最壞的經濟政策，是政府設立國營事業直接參與市場營運，因為其結果不但會出現與「民爭利」的局面，而且還降低經營效率，對經濟運行造成莫大的障礙。

司馬遷更言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史記》。意思是普天之下芸芸眾生熙來攘往，都是為了個人利益在奔忙，縱然擁有千輛車馬的王者，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治理百家的士大夫，尚且擔

<sup>13</sup> 重要的如商鞅變法時之秦孝公及漢武帝。

心貧窮，何況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呢！由此可見，司馬遷頗重視人的金錢利益，所以他推崇在位者所施行的律例，必須以法乎自然及順乎人性為出發點。

對於藏富於民理念，我們可從下述史實發現其思想始終絲毫沒有退減：傳統農業社會，政府為避免土地兼併，及提高農民收入，歷代一些統治者都曾推出「均田」政策。最早實行「均田」要數西周的「井田制度」、西漢初年呂后主政，也曾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均田」政策、其後新朝王莽及北魏孝文帝都分別執行「均田」政策。「均田」是將農地平均分配給平民耕種，在經濟意義上它含有近代「社會主義」平均分配的觀念，然而中國傳統的「均田」政策，只是針對資本財的平均分配，平民在農作上的收益，除去田稅後，全都歸他們所有。因此沒有收入均分的限制，它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及政府承認平民擁有財富的自由經濟政策。

自漢武帝（141 BC-87 BC）接受董仲舒（179 BC-104 BC）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列為統治思想，儒家的經濟學說就紮根於中國。儒家經典中有很多與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學說相關的論述：

### 3.2.1. 盡人之性

法乎自然、順乎人性、無為之治、藏富於民及維護競爭等，都是自由市場制度所需具備之條件。《中庸》有如下一段文字：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裡「能盡其性」中的「性」，據朱熹（1130-1200），解釋是指天道，即自然，所以「盡其性」就是順乎自然法則。法乎自

然，「會使萬物並育而不傷害，道並行而不悖」《中庸》，這正是自由經濟制度的境界。

### 3.2.2. 效法自然

盡人之性是效法自然的表現，孔子（551 BC-479 BC）曾經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禮運》。他所主張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堯曰》，就是盡人之性。孟子（372 BC-289 BC）對「性」的解說是自然行為之趨勢，能順應此趨勢才是大智之人。他以大禹治水為例，指禹採順其趨勢之道理以疏導法治水，最後毫不費力地達成治水目標。孟子所講之「性」，是一種順乎人性所作的隨勢利導工作，正是自由經濟的根本。

### 3.2.3. 無為而治

儒家心目中的「最佳政府，最小統治」之「無為而治」政治觀點，跟自由經濟主張的市場導向及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事務之主張一致。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對於「無為而治」，孟子認為不僅不應該發生損及人民利益之政府干預事情，而且要排除有動機干預及無結果的政府行為，所以他以揠苗助長故事告誡，要求政府莫庸人自擾。

### 3.2.4. 私有產權

私有財產權制度是維繫市場機制不可或缺的條件，因此保障私有財產權對自由市場至為重要。在孟子的思想中可以看到類似的主張：「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滕文公上》。這不僅肯定私有財產，更由此發揮教化意義。為保障私有財產，儒家強調要藏富於民，民富則國也富。孔

子說過：「百始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荀子也說過：「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富國》。

### 3.2.5. 藏富於民

對於藏富於民的方法，儒家有兩種看法：一是便民而不聚斂擾民、二是利民而不與民爭利。前者是不妨礙人民創造財富之活動；後者是減少人民財富之損失，如薄稅。利民是因其所利而利之，不與民爭利的現代涵義，是政府不經營生產活動。《禮記》有如下記載：「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教君子士則不稼，……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荀子也說：「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塲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臧」《大略》

### 3.2.6. 自由競爭

自由市場必須具備自由競爭，妨礙自由競爭的主要因素，就是壟斷或獨占力量。對於這種力量，孟子是深惡痛絕，他說：「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糾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於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孫丑下》。

至於城市化的發展，我們知道中國城市是長時期存在的，很多城市都有兩千年的歷史（葉龍，2016）。以春秋戰國時各國的商業城市為例，這些城市的建設，春秋戰國以後仍然保存下來，且對日後歷代商業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但如此，兩漢以後有更多大城市湧現，尤在南北朝時大量人口向南方遷移，導致當地沿海一帶出現很多大城市，如：廣州、泉州、福州及揚州等，這些沿海城還推動了日後海外貿易之活動。

### 3.3. 唐代蓬勃的國際貿易

經過南北朝分裂及隋之統一，中國經濟發生了兩項轉變：一、是經濟重心由北方轉向南方長江流域一帶；二、隋煬帝（569-618）開鑿運河，打通了南北交通管道。這些轉變使北方政治重心所需的物資，及全國各地城鎮向中央繳納之賦稅，使用新鑿運河運送，節省大量運輸時間及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唐代（618-907）就在這樣環境下繼承了隋朝的天下。唐的工商業也非常發達，一方面承襲漢代養蠶製絲行業，而且陶瓷工業亦非常發達，「白瓷」及「唐三彩」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产品；另一方面，唐代武功顯赫，四夷臣服，這些工業產品通過西北「絲綢之路」與西亞各國貿易。這是陸路貿易的主線。

至於水路貿易，南方沿海城市，如：揚州、泉州及廣州，是與海外進行貿易的重要港口。揚州是唐代南北糧、草、鹽、錢、鐵的運輸中心和國內、國際交通的重要港口，在以洛陽為中心的隋唐大運河沿線水陸交通中，揚州作為重要的港口城市與國際交流中心，始終扮演著骨幹作用。唐代揚州與國際交流密切，波斯、伊斯蘭哈里發、婆羅門、崑崙、新羅、日本等國客商多有僑居。除了商業交流以外，揚州還是當時先進的中原文化向東北亞地區流布的重要節點。日本遣唐使來訪和高僧鑒真（688-763）東渡日本，促進了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唐代中期，對外通商貿易不斷擴大，來泉州的外國使臣、商人和傳教士日益增多，出現了「船到城添外國人」「市井十洲人」的盛況。當時「泉絹」與青花瓷、銅鐵品均遠銷海外，泉州港對外通商貿易在全國居於重要地位。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和樞紐之一，廣州的繁盛景象一度達到頂峰。自開闢從廣州到爪哇和阿拉伯的航道之後，海上商船來往十分頻繁。唐政府採取鼓勵海外貿易的政策，外商可在中國自由貿易，聚集在廣州的外商有十多萬人。此時，廣州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並從未關閉過的貿易通商口岸，不僅是全國最大貿易港，也是世界貿易大港，更同時是中西文化宗教的交流重地，各國高僧、傳教士陸續經由廣州來到中國。

隨著絲綢及瓷器貿易的蓬勃發展，對貨幣及金融需求日漸殷切。唐以前只有銅錢用作交易媒介，銅錢面值小又重，只適宜作零錢使用。唐代南北交通暢達，假如在四川出售瓷器的商人要到江西進貨，在途上便需要攜帶大量銅錢，故頗為不便。唐憲宗（778-820），時，一種類似現代的滙票出現，稱為「飛錢」，它是中國日後使用紙幣的雛形。

使用「飛錢」的方法是商人將銅錢交給各地方行政區在京城（長安）的辦事機構（進奏院），或各地設的分支機構，然後從機構單位取得半聯憑證，另半聯憑證寄回各地的相應單位。商人回本地區後，經驗證相符，便可取款。唐代內地與邊遠地區、外國通商日盛，許多商人奔波於崇山峻嶺戈壁沙磧之間，就可以憑藉一紙憑據隨時隨地兌換現錢。這樣，不僅安全，還免去了諸多麻煩與勞頓。

借貸行業是唐代因貿易發達所產生的金融活動。戰國時期（475 BC-221 BC）已經出現民間借貸活動，當時的目的並非因商業需要而借貸；到了秦、漢（221 BC-220），商人開始逐漸成為貸款行業的主要顧客；到了唐朝，由於社會經濟高達發達，貸款也變得越來越普遍，而利息的計算也更為合理。都城長安的西市，各種錢莊、當舖林立，因此這裡也成了中國最早的金融一條街。唐代放款大致分為兩種：一、信用放款，是南北朝（420-589）時開始的「舉貸」；二、抵押放款，

最常見的是當舖，稱為「質庫」。唐代對於借貸活動的利率有所限制，雖然允許上下浮動，但對於複利始終是禁止的。

許多現代的商業模式在唐代已經呈現，可想而知，當時社會的經濟繁盛程度較諸南北朝及隋朝（581-619）更甚。難怪不久之後出現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兩宋（960-1279）。

### 3.4. 中國經濟的黃金時期宋代

從城市化程度、國民生產總值及百姓生活水準來衡量一國經濟的發展水準，中國經濟發展自春秋戰國開始，至兩宋達到巔峯，套用現代術語，當時中國屬於成熟經濟國家。我們從下列資料可以得知，兩宋的經濟表現確實是歷朝之冠：

#### 3.4.1. 大城市普遍出現

城市人口的多寡、工商業繁榮程度，是量度大城市的指標。北宋仁宗時期（1010-1063）東京汴京人口已經超過一百萬，當時歐洲大城市人口只有十萬左右。洛陽、成都、揚州、蘇州及廣州等大城市亦相繼崛起<sup>14</sup>。隨著政府開放所有行業，各種工商業及手工業在當時大城市內隨處可見。從《清明上河圖》中，所有一切都出現商品化<sup>15</sup>，可見當時經濟的繁榮程度。

#### 3.4.2. 生產總值達世界高峯

兩宋處於西洋史上稱為中世紀的中期，那時歐洲仍是西方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當時歐洲農業因科技的改進帶動繁榮的貿易，而且由於出現一個不正常氣候溫暖現象，使農業產量驟增，導致人口大量增長。由農民向貴族支付地租和承擔勞役的生產組織——莊園，成了中世紀

<sup>14</sup> 《中國金融史 3000 年中編》，陳雨露、楊棟著。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0 月初版 P.3.

<sup>15</sup> 同上書目 P.2

中期主要的社會組織結構。然而，宋朝的人均生產總值較當時歐洲高出 5.2%（詳見表 1），足見兩宋的勞動生產力高於同期歐洲。

單位：國際元<sup>16</sup>

	西元 960 年	西元 1279 年	平均
兩宋	450	600	525
歐洲	422	576	499

表 1：兩宋與歐洲當時人均生產總值比較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麥迪森著，伍曉英、許憲春、葉燕斐、施發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1 月第一版，P.30 圖 1.4（數字取自圖中數據，筆者整理成上表）

### 3.4.3. 百姓生活質素提高

透過專業化分工及自由交易，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A. Smith）。因為從自給自足發展到完全分工，對專業化程度、社會結構多樣化程度、貿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市場一體化程度、生產集中程度、交易次數及總交易費用、生產率都有所增加（楊小凱，2003）。當社會生產率及財富都增加時，百姓生活質素自然提高。兩宋雖然在工商業已有高度發展，但絕大部份人仍是以務農為生，惟不同者是兩宋的農民並非純以自給自足為生。他們的產品除了自己享用外，還可以商品形式在市集上出售。當時作為主要商品的農產品包括：糧谷類有谷、粟、麥；鮮活類有蔬果、水果；家禽類有牛、羊、雞、豬等。紡織品方面則包括：絲織、麻織、毛織及成衣加工<sup>17</sup>。不但農民從上述商品交易中獲得利益，市場上也因商品多樣化，增加百姓的選擇而使生活質素提高。

再者兩宋進出口貿易也異常發達，進口品種類眾多（詳見表 2），重要是宋朝進口品的消費不像前朝只限於皇宮貴族階層享用，一般百

<sup>16</sup> 以 1990 年美元購買力為計算單位

<sup>17</sup> 《宋代商品供給研究》，張錦鵬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一版，P.592。

姓尤以京城附近居民也大量消費<sup>18</sup>。

兩宋屬於大量消費時期是無庸置疑。我們不妨再比較北宋（960-1127），人均商品消費額與人均生產總值加以引證。北宋每年商品交易額估計約在 8,000 萬至 44,000 萬貫，若以當時約一億人口算，平均每個人一年在商品消費上的金額約為 0.8 至 4.4 貫，而且南宋（1127-1279）數字較北宋高<sup>19</sup>。若取平均數 3 貫，折算為 2000 年之幣值，約為 900 元人民幣<sup>20</sup>。根據表一人均生產總值是 525 國際元，相當於同年（1990 年）人民幣 2,258 元<sup>21</sup>，經通脹調整，約為人民幣 4,854 元<sup>22</sup>。因此可以推測北宋人均商品消費佔人均生產總值約 18.5%，這麼高的消費水準，只有宋一代才能擁有。自此以後，中國經濟走上回頭之路。

種類	品名
珍寶	金銀、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翠羽、瑪瑙、貓兒眼睛、琉璃
香料	沉香、乳香、降真香、龍涎香、薔薇水、檀香、箋香、光香、金顏香、篤耨香、安息香、速香、暫香、黃速香、生香、麝香木
藥材	蘇木、阿魏、肉豆蔻、白豆蔻、沒藥、胡椒、丁香、木香、蘇合油、血竭、腦子、鹿茸、茯苓、人參、麝香
日常用品	吉貝布、番布、高麗絹、綢布、松板、杉板、羅板、烏婪木、席、摺扇
軍事用品	硫磺、鑛鐵、日本刀、皮貨、筋角

表 2：兩宋進口商品分類表

資料來源：《宋代海外貿易》，黃純豔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一版，P.55 表 1-3

<sup>18</sup> 《宋代海外貿易》，黃純豔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一版，P.197。

<sup>19</sup> 《簡明中國經濟通史》，鄭海欉主編。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第一版，P.317。

<sup>20</sup> 1 貫=1 兩銀子=300 人民幣

<sup>21</sup> 1990 年 1 美元兌約 4.3 人民幣

<sup>22</sup> 1991 年至 2000 年十年內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約等於 114.98%

### 3.5. 洋人進入對明清經濟的衝擊

明代（1368-1644）的國民在衣、食方面得到充足供應，初期尚能承接宋代的富庶與繁榮。元初，種植棉花開始普及，棉花是南北朝時由印度傳入的一種農作物。元代（1271-1368），松江府（今上海）的婦女改良了棉紡織的技術，使生產效率大為提高。明太祖（1328-1398），朱元璋建國後，大力推廣棉花種植，棉田的面積較元末時增加了4倍多，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製造業。據吳承明的研究，明、清兩代每年生產約6億匹棉布，價值1億兩白銀，其中52.8%是在市場出售的。

食的方面是水稻，宋初從越南傳入水稻，分別在長江、淮河、及兩浙等地區推廣，由於水稻耐旱、適應性強、不擇地而生、而且生長期短，可以配合晚稻<sup>23</sup>成為雙季稻，使穀物產量大為增加。中國從北宋的1億人口，激增至清初3億，主要就是靠水稻養活這麼多人口。

「水稻革命」及「棉花革命」並沒有為中國帶來長期經濟穩定，相反，由於大量生產水稻及棉花帶動經濟增長，然而因白銀短缺，造成通貨緊縮。中國向來用銅錢作貨幣用途，它的好處是本身具價值，相對於宋、元以來所使用的紙幣，不容易因統治者的貪婪而濫發；壞處是銅錢的面值小，鑄造的工序繁多以致成本高，因此每單位銅錢的發行成本也高。白銀則不同，它的鑄造成本雖然不低，但面值大，分攤到每單位白銀的發行成本較低。

明初在這樣情況下逐漸使用起白銀，但白銀在中國的存量有限，「銀荒」導致經濟收縮。假如一個國家經濟總量增加，卻缺乏足夠的

<sup>23</sup> 插秧期較晚或成熟期較晚的稻子。

貨幣進行交易，物主惟有減價才可以將產品售出<sup>24</sup>，當物價持續下跌，經濟就進入衰退。有研究指鄭和(1371-1433)，七下西洋(1405-1433)的目的，表面是開啟東南亞及西亞國家貿易之門，實際是由這些國家換取歐洲的白銀。

糟糕的是，明代於「銀荒」下在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1430)後卻因海盜問題禁止國民出海，實行「鎖國政策」，國際貿易迅間停頓，白銀西來自此斷絕。雖然1565年西班牙人佔據呂宋島(今菲律賓)，明廷容許西班牙人與國人貿易，白銀可再次流入，但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在呂宋島多次與西班牙人衝突後，中西貿易一度中斷。

正當鄭和之後中國航海事業停頓不前時，歐洲卻全力發展航海事業。1492年義大利人哥倫布(C. Colombo, 1451-1506)發現美洲；1519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 Magellan, 1480-1521)橫渡大西洋、穿越美洲、進入太平洋，發現一道東來亞洲的便捷路線。自此歐洲殖民主義及歐人東來成為十六、七世紀國際關係的主流。

明末，東來的洋人主要有荷蘭人、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她們扣中國門戶，當然為的是貿易。當時明廷實行鎖國，不與外人通商，因此列強分別佔據台灣、呂宋、及澳門，以便跟中國內地貿易走私者通商。滿洲人入關後，清室(1644-1911)仍然維持鎖國政策。康、雍、乾三代(1662-1796)一方面訂定了清代的強盛，另一方面卻令清廷對外態度更形自大。

十八世紀英、法、俄等國已經取代荷、西、葡成為歐洲殖民霸主。她們屢次遣使要求清廷開放通商港口，都被清廷藉詞推搪。然只有兩項有關通商事宜者：一、是1689年與俄國簽署的「尼布楚條約」，它

<sup>24</sup> 貨幣數量方程式  $PT=MV$ 。其中 P 為物價，T 為產品數量，M 為貨幣量，V 為貨幣流通次數。如果貨幣總量不變，即 M 及 V 固定，當產品數量 T 增加，物價 P 只有下降。

是大清與外國所簽的第一條通商條約，容許兩國國民在邊境貿易；二、是 1757 年當時乾隆（1711-1799）允許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直至鴉片戰爭後的 1842 年。

陶瓷、絲綢、茶業是中國自古以來三種對外貿易量最大的商品，歷代主要經兩條通道將這些商品輸往國外：一條是從長安或洛陽到玉門關、陽關，西至蔥嶺，再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達歐洲；另一條是從泉州、廣州、寧波、揚州等港口出發經海路到達朝鮮、日本、琉球，東南亞沿岸島嶼，南亞，阿拉伯，並由阿拉伯人將之轉輸歐洲。歐洲人非常熱愛這些中國商品，元時威尼斯人馬哥孛羅（M. Polo，1254-1324）從中國帶回歐洲第一隻瓷瓶，此後的四百年間，瓷器在歐洲引發了瘋狂的痴迷和收藏熱；茶業更是英國人每天必備的飲品。

可惜十九世紀以後，陶瓷、絲綢、茶業出現了競爭對手。英國研發出比中國陶瓷強度更好，更薄、更輕的「骨瓷」，而且大量生產銷往歐洲其它國家；日本改良製絲技術，使用烘箱、繅絲方法，使蠶絲粗細均衡、斷頭又少，終超越中國成為最受歡迎的亞洲細絲；俄國引進中國茶苗，在高加索地區開闢茶園、英國在印度種植印度茶業，並將之帶到錫蘭（今斯里蘭卡）。凡此種種皆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

中國在傳統產品上喪失競爭優勢，嚴重減少了白銀的流入，加上「鴉片戰爭」後歷次對外作戰都敗陣而回，賠款之數逐次飆升，幾達天文數字。面對國庫空虛及西方列強欺凌，滿清漸漸走上滅亡之路。

### 3.6. 中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原因

工業化、城市化、自由經濟思想、蓬勃的貿易及大量消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表徵，中國從先秦至清中葉的社會都持續地存在這些經濟現象，看似儼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但實際上，中國自始並沒有

走進資本主義道路，充其量只是商業資本主義，與現代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相差甚遠。中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可從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傳統經濟特點加以說明。

### 3.6.1. 中西政治制度的差異

制度對資本主義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上面章節已有敘述。英國能夠成功推行工業革命，走上資本主義富強道路，原因是民主分權的政治制度，民主能夠制訂一套維護國民利益的法律，相反，獨裁國家的法律只為部分甚至個人利益服務。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如果沒有專利法保障技術研發者，不會有蒸汽機、鐵路、電報、及電話等自動化設施出現。

西方民主制度建基於四大支柱，分別是：議會制度、自由競爭制度、自由思想制度、及私有產權制度。圖 2 列出了它們的關係。民主制度的基礎是自由平等、反獨裁，所以在這基礎下國家設置議會制度，一切法律由民選的議會制訂；商業上打擊壟斷企業，強調自由競爭必須在企業間存在；政府不干預市場的自由主義思想在人們心目中是牢不可破；而且法律上確認人們的私有產權。具備這四大支柱，國家權力分散，國民有從商或參政自由，鞏固了民主分權制度。



圖 2：民主分權四大支柱



反觀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政治制度都是中央集權制，統一是中國歷代王朝君主之理想，不但政治上的統一，如秦、漢及唐、宋等大一統國家，而且更重視行政統一，所有權力集於中央，由皇帝一人決策。專制、獨裁由是而生。要維持集權統治，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會精英控制模式、及宏觀經濟模式都必須與之配合（吳曉波，2014）。

基此，確保中央對地方人事任命權的「郡縣制度」；實現全民意識形態上大統一的「尊儒制度」；將社會精英吸納到體制內為我所有的「科舉制度」；控制國民生計的「國有專營制度」（吳曉波）成為中國社會維持統一的支柱，並深深植根在中國社會裡。中國四大制度支柱之目的是鞏固統治者權力，西方四大制度支柱是讓全民監督統治者表現，兩者互相對立。政府權力過大易於干預市場運作，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明以後經濟表現不彰，及十九世紀中國經濟變革失敗都是由於中、西政治路向迥異所致。

### 3.6.2. 傳統中國經濟社會特點

傳統中國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社會，與中國傳統經濟特點有關，包括：

#### A. 缺乏剩餘資本經濟資金不足

中國是農業社會，特點是小農經濟，農民只能自給自足，偶爾將剩餘下來的農作物出售以換取金錢，但這情況並不多。原因是大部分農民擁有的農田數量有限，耕作收入往往僅及農民一家的消費<sup>25</sup>；其次由於中國雖有大城市，但農村與附近城市之距離又遠，農民只能將剩餘

<sup>25</sup> 從西周「井田制度」開始，「均田」觀念一直植根於中國傳統社會裡，雖然戰國以後，容許私田存在，但歷代亦間斷地重行均田制。如王莽時期、北魏孝文帝時代、唐代初年、北宋歷朝變法者，都實施或提出「均田制度」。

的農作物在市集中出售。因此，中國自始就處於一種既不繁榮也不貧窮的統一體中<sup>26</sup>。在這樣一種經濟體系裡，中國怎會存在龐大資金的私人企業？再者，縱使人們希望追求個人私利及利潤，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不甚富裕的國家，缺乏充足資金又怎可如願？雖然中國在封建制度崩潰以後，社會確實出現不少轉變，諸如城市迅速發展、漕運與道路又不斷開發、貨幣亦廣泛被使用，對外貿易一度蓬勃起來、出現私有產權制度及自由交易之現象。中唐以後，「私田」制度發展到容許農地自由買賣、宋代這種買賣更逐漸受到法律保障<sup>27</sup>，這是農地成為私有產權的例證<sup>28</sup>，及自由市場存在的事實。明代後期更因東西航路的發現而出現與西洋通商的情況，清以後更不在話下了，在西方「船堅砲利」下，逐漸打開中國的貿易市場。然而這些商業活動受到政府干預及缺乏一套完善的商法保障，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始終沒有落戶。

### B. 統制經濟思想的幽靈始終不散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期，「百家爭鳴」是當時學術思想發達的表現。當時的一些重要學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對以後中國的影響非常深遠，包括這些學派的經濟思想。簡而言之，道家崇尚「自由放任」政策，主張「私有產權」、「自由市場」、「政府不干預」等經濟制度，它與西方經濟「古典學派」(Classical Economics) 亞當史密斯 (A. Smith, 1723-1790) 的觀點不謀而合；法家重視「管制」，主張政府適時採取措施調節經濟，避免經濟出現大波動及保障國民的最低生活條件，此即所謂「統制經濟」觀念，它與「新古典學派」(New

<sup>26</sup> 參考 Ramon H. Myers 《Customary Law, Markets, and Resource Transac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up>27</sup> 見劉永成著，《中國租佃制度史》，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初版，P.98 及 P.119 至 121

<sup>28</sup> 私有產權包括：使用權、收入擁有權及自由轉讓權。

Classical Economics) 凱恩斯 (J. M. Keynes, 1883-1946) 的觀點一致；儒家則揉合道家的「自由放任」精神與法家的「統制經濟」觀念，有時鼓吹「自由市場」，有時又提出政府干預政策。無可否認中國數千年文化，儒家思想佔主導地位，因此即使中國自先秦以後已出現「私有產權」及「自由市場」制度，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亦無日無之。春秋末，戰國初，商業活動開始出現，越國的范蠡及衛國的呂不韋都因從商而成巨富；但到了西漢初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實施一連串抑制商人的「新經濟政策」，除將山、林、池、澤等天然資源收歸國有，限制商人經營外，還推出「均輸法」及「平準法」來限制物價波動，避免商人囤積居奇以圖利，此政策思想自此成為中國士大夫心目中解救民間疾苦牢不可破之真理，對中國千多年經濟成長造成嚴重壞影響；王莽篡漢以後，更恢復土地公有制及繼承漢武帝的國營事業與「均輸」、「平準」政策；然而唐、宋時代隨著櫃坊<sup>29</sup>、飛錢<sup>30</sup>及交子<sup>31</sup>等出現，商業貿易又蓬勃起來，加上海、陸交通大規模發展，對外貿易成為新興的商業活動，但由於傳統「禁榷制度」<sup>32</sup>依然存在，許多民生食用，如鹽、鐵、酒及貴重的絲綢仍不准民間經營，加上北宋多次變法<sup>33</sup>中，「統制經濟」之政策揮之不去，商貿活動始終未能出現突破性發展；明、清之經濟較接近資本主義性質，重要者如明神宗（1563-1620）萬曆年間（1573-1620）出臺之鹽法，鹽由官專賣改為商專賣，從此只有綱冊上有名的鹽商才可運銷食鹽，他們獨占鹽利，

<sup>29</sup> 櫃坊是由邸店衍生出來的，最遲在唐玄宗開元初年（713）已出現。經營的業務是代客商保管金銀財物，收取一定的租金，商人需用時，憑帖（相當於支票）或信物提取。

<sup>30</sup> 飛錢，又稱便換，是中國產生最早的貨幣匯兌方式。請參閱本文 3.3。

<sup>31</sup> 交子是世界上紙幣的雛形。交子鋪收入客戶現金，發給交子為憑。交子由飛錢發展而來，後來成為與銅錢具有同樣職能的信用貨幣。

<sup>32</sup> 禁榷制度是指政府對某種商品的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禁止私人經營，目的是為了獲取巨大利潤。禁榷的物品都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

<sup>33</sup> 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的「熙寧變法」中，「均輸法」、「青苗法」、及「市易法」等都是與民爭利的「統制經濟」政策。

世代相承。另外商業資本侵入手工業生產領域，加上科技漸趨發達，各種手工業如雨後春筍。但是由於政府限制商業活動全面私營化，縱使容許私營，亦透過「官督民辦」規限私人商業發展、明初及清初政府實施海禁，海外貿易更一度停頓。從中國歷史經驗看，中國的經濟從春秋戰國至清末之發展過程中，確實出現了長足的成長，可惜在不同時期，不同統治者手裡，往往間歇地推出一些壓制自由市場運作的制度，無形中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勢頭剎下馬來。

### C. 抑商觀念貶低商人社會地位

中國傳統認為商業是一種剝削公眾利益的經濟活動，因此自古就有所謂「奸商」之說。在各種行業中，最能牽動走上資本主義之路是商業，然而中國自古對商人存有負面感覺。自封建制度崩潰之後，社會上出現了士、農、工、商四個流品。流品不同於封建時代的貴族、諸侯、卿大夫、與平民，彼稱為階級，其特點是下層隸屬於上層、流品則沒有此種關係，法律上並沒有誰隸屬於誰的規定，彼此社會地位是對等的。

然而商人的地位在人們心目中卻並不高尚，這是由於古代商人所從事之活動，如產鹽、採礦、造鐵等皆取自天然資源，中國自古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商人對天然資源之開採，直接侵害了王家的財產，難怪漢武帝要把來自山、林、池、澤收歸國有，把該等地方之資源所生產的物品由政府經營，商人更被冠以盜匪之名。也因此歷代政府對商人所得都抽取很重的稅款。再者，傳統中國政府由「士」所組成<sup>34</sup>，「士」是指只有恒心而沒有恒產的人，所謂恒心，是弘揚中國文化精神中之「道」。漢朝透過地方推薦加入政府、魏晉南北朝(220-589)時，將人才分為九等，稱「九品中正制」，依據門第之高低進入政府；

<sup>34</sup> 見錢穆著，《中國歷史精神》，蘭臺出版社民國九十年二月，第52頁。

隋唐以後「士」可以通過科舉成為政府官員。所以中國自始就擁有一個「士人政府」，中國文化之精神是「士」只有為公眾服務的責任，除此以外，其他一切事務都不得兼顧，所以傳統上不容許政府官員參與商業活動，也因此商人與政府的關係就涇渭分明了。

#### D. 「分家析產」制度存於中國大家庭中

傳統中國社會重視大家庭，每個家庭的父母均希望盡所能生育更多孩子，原因是在農業社會裡勞動力與產出成正向關係。一個大家庭，當父母親過世後，已成家的孩子們便會離開從小居住的家庭，不再與兄弟姊妹住在一起；假如父母擁有萬貫家財，他們會將財產分予所有子女，此即所謂「分家析產」。是漢朝以後的主要繼承制度。

從經濟角度看，分家使家庭原有資產分化，若由經營規模來看，其實是不利的，因為生產資本集中，才有利於開發新技術提高競爭力，也能更有效運用所擁有的物資；分產以後，子女們所擁有的資產相對減少，不利於從事大規模的商業活動。由於有「分家析產」，大型的商業組織營運到一定時間後，便會分拆給予經營者的子女，正因這樣，中國的商業組織一直沒法積聚雄厚資本，規模也只能處於中或中上層次，故資本主義在中國始終遙不可及。

小農經濟、政府干預、鄙視商人、及分家析產使傳統中國無法走進資本主義社會，而這四項特徵都是由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下四大制度支柱所形成，因此可得結論：中國無法踏上資本主義社會，是由於制度原因所引致。

### 3.7. 小結

完備的基礎建設是工業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因為它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及由於在自由政治及經濟制度下方可出現這些建設。中國

傳統是自由主義及市場導向經濟，但資本主義始終無法在社會植根，其原因對思考洋務運動失敗具有啟發性。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工商業已經興盛，大城市也相繼發展。齊桓公時管仲變法，制訂鼓勵貿易、單一稅制、調控物價等利商政策。自由市場是經濟發展的良方，漢朝時司馬遷將儒家自由市場思想發揚光大，儒家經典關於自由市場觀念，有法乎自然、順乎人性、無為之治、藏富於民及維護競爭等。

到了唐代，工商業益形發達，絲綢及陶瓷如「白瓷」及「唐三彩」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产品。經水路的國際貿易，使揚州、泉州及廣州成為重要通商港口，外商並多聚居於此。與國際如波斯、伊斯蘭哈里發、婆羅門、崑崙、新羅、日本的交流密切。由於貿易的廣泛，稱為「飛錢」之紙幣、借貸活動、控制貸款利息等已在社會上出現。

兩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從以下列資料可見一斑：城市人口是工商業繁盛的指標，當時首都汴京人口超過一百萬，歐洲大城市人口只有十萬左右；宋朝的人均生產總值較當時歐洲高 5.2%；農民的产品除扣除自用外，還有剩餘在市集出售獲得收入；進口品種類繁多，不像前朝只限於皇宮貴族享用，一般百姓也可大量消費。

明朝早經「水稻革命」及「棉花革命」，國民在衣、食方面都能夠得到充足供應，然而卻因白銀短缺，造成通貨緊縮，在鄭和於 1430 年七次下西洋後，因海盜問題禁止國民出海，實行「鎖國政策」。其時歐洲全力發展航海事業，殖民主義及歐人東來成為十六、七世紀的國際關係。

滿洲入主中國後，仍然維持鎖國政策。十八世紀英、法、俄等國屢次遣使要求開放通商港口，都被清廷藉詞推搪。中國生產的陶瓷、絲綢、茶業是自古對外貿易量最大的三種商品，十九世紀後卻出現競

爭對手：英國研發出比中國更佳的「骨瓷」，大量在歐洲銷售；日本改良製絲技術，超越中國成為最受歡迎的亞洲細絲；俄國及英國分別在高加索及印度種植茶業。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

中國自古具有工業化、城市化、自由經濟思想、蓬勃的貿易及大量消費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但始終沒有走進資本主義道路，原因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傳統經濟特點有關。

西方的政治制度建基於議會制、自由競爭制、自由思想、及私有產權制四大支柱；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權，目的是維持政治及行政上的統一，郡縣制、尊儒、科舉制及國營事業是中國社會維持統一的四支柱。西方四大制度支柱是讓全民監督統治者表現；中國四大制度支柱目的是鞏固統治者權力。政府權力過大易於干預市場運作，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中國社會經濟特點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中國社會經濟有如下特點：小農經濟，農民只能自給自足；農村與城市距離很遠，農民的剩餘農作物只能在市集出售，因此沒法產生龐大資金的私人企業；儒家揉合了「自由放任」與「統制經濟」觀念，歷代王朝時而鼓吹「自由市場」，時而實行政府干預，因而打擊自由市場運作，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國自古對商人的感覺較為負面，原因是商人從事產鹽、採礦、造鐵等行業所使用的原材料，被認為是侵害皇家的財產，抑制商人遂成了歷朝不成文政策；漢朝以後「分家析產」的繼承制度，使中國社會的商業組織沒法積聚雄厚資本，因此難以形成資本主義經濟。

## 第四章 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展開了一場模仿西方事務的運動，稱為自強運動或洋務運動，該運動有三個特點：一、是受西方經濟侵略下的一次自發性內部改革；二、這次運動的改革項目並不十分全面，針對的只是西方實業建設；三、雖然運動最後失敗收場，但整個改革卻未完全終結，既有的建設仍舊保有，而且還引發往後連串的改革，形成中國現代化之路。

洋務運動是指中國在 1860 至 1894 年間，推行的一切模仿西方的實業建設。用這兩個年份作為洋務運動的起、迄點，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意義：1857 年英國與法國因欲增加更多通商機會，藉口商船被毀及教士被殺，兩國聯軍直搗北京，燒毀了圓明園及大量掠奪文物珍寶，1860 年當戰役結束，有識之士深感受到極度屈辱下，萌生變革念頭，由於一些士大夫曾接觸西方文物，感覺其可用及能補自身之不足，遂開啟學習使用西方的事物。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國人原以為可望與西方看齊，怎料在 1894 年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所引發的一場戰爭，改革多年的中國海軍被日本打得七零八落，成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記。

### 4.1 歷來對洋務運動失敗原因的分析

這裡有需要討論洋務運動失敗與否的問題，史家歷來把甲午戰敗之年訂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時間，但是甲午戰後，過去的洋務建設並沒有撤銷，而且往後仍出現更多這類的建設，如各類軍需物品製造局、煤礦局、輪船及機器局、西式學校及翻譯機構、鐵路建設等仍然繼續運作；1900 年後陸續出現不同行業的民營實業，如棉紡織業、繅絲工業、麪粉工業、水泥工業等；不僅如此，造船不再局限於軍艦，製



造商船之企業亦不斷湧現，而且由私人經營；私營的鐵路及煤礦、鐵廠亦紛紛出現。這些實業不因甲午戰敗而消失，對日後中國現代化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不能說洋務運動失敗。然而甲午戰役中，經營十多年的北洋艦隊，在豐島海戰及黃海海戰中全軍覆沒，確有悖於當時國人的預期，在人們極度失望之餘而承認改革失敗也合乎常理。因此可以肯定，在甲午戰敗的時點上，洋務運動確是失敗的。

歷來學者多從內容方面，財政方面，政治方面及國策方面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本文認為這些分析只限於表面化，沒有從深層次的組織與制度層面來考慮，因此作出的結論流於空泛，更難用事實證明其因果關係。現在姑且對這些原因作一敘述。

#### 4.1.1 內容方面

只著重西方的實業建設，缺乏全面性改革，並以中國固有體制為變革的基礎。主持洋務運動的大臣根本欠缺長遠目標，沒有躋身列強、驅逐強虜、爭衡天下的想法，只是將西方資本主義之經濟和技術的局部，截取嫁接到已經千瘡百孔的統治機器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主持者堅持中國文化較西方文化為優，從李鴻章（1823-1901）奏請設立江南機器局的奏摺中可見，「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獠狃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於仿習機器」，李相信中國的文物制度比外國獠狃之俗好，不過亟則治標，非取外人之長技以為中國之長技不可（李劍農，1942）。由於西化既要變「體」又要變「用」，而洋務運動乃在「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的方法下，只變「用」而不變「體」，「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因此失敗告終。

### 4.1.2 財政方面

洋務運動在太平軍、捻軍等十幾年的騷擾和兩次鴉片戰爭<sup>35</sup>的巨額賠款中誕生，當時清室的國庫空虛達到了極點，太平天國動亂後，到清王朝滅亡的近七十年間，清王朝的財政狀況都沒有實質性的好轉。清廷在咸豐朝已經出現財政危機，道光三十年（1850），國庫只有 187 萬兩，到 1853 年 6 月，戶部存銀只有二十二萬七千兩（鄭曦原，2018）。但是歷次戰爭賠款，構成了國庫嚴重的壓力，南京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兩；天津條約共賠償四百萬兩；北京條約賠款增至一千六百萬兩。洋務建設的多樣化及投資金額龐大，令政府財政百上加斤，江南製造總局開設時的投資費用為二十五萬兩，每年至少需要四十萬兩以上的經費，後來由於入不敷出，尤其缺少技術基礎的造船部門，在李鴻章以外購軍艦為優先政策後，船塢長期沒有新造船隻，處於閒置階段。北洋水師是洋務期間所建立的四大水師<sup>36</sup>中規模最大的一個，時額定軍費每年二百萬兩，前期的軍費來源為海關稅收及沿海省份徵收的厘金<sup>37</sup>，後期軍費則由海防捐款<sup>38</sup>、海軍鉅款<sup>39</sup>、戶部撥款而得，單憑國庫實不足以支付，重要的是，部分海軍鉅款被慈禧太后（1835-1908）挪用來修建頤和園，甲午之戰北洋海軍不堪打擊，是由於多年沒錢購買新型軍艦，導致在海戰洋艦隊全軍覆沒，遂使洋務運動壽終正寢。

### 4.1.3 政治方面

太平天國動亂以來，清廷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清王朝「外輕內重」和「旗重漢輕」的政治格局逐步轉變為「外重內輕」及「漢

<sup>35</sup> 第一次鴉片戰爭指 1842 年中英因鴉片貿易所導致的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指 1856 至 1860 年英、法兩國因貿易及教案問題與中國衝突所造成的英法聯軍之役。

<sup>36</sup> 四大水師是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及福建水師。

<sup>37</sup> 是咸豐三年（1853）新增的商稅，包括每月按營業額徵收 1% 的稅，及在陸路設置關卡徵收的通過稅。

<sup>38</sup> 出售虛位官職所得的款項。

<sup>39</sup> 由是慈禧牽頭，然後由各督撫籌集得到的款項。

重旗輕」的政治格局，清王朝中央政府權威被削弱。慈禧太后和旗人中央大臣為了達到平衡各個政治勢力派系，使其相互牽制的目的，只給洋務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比如只提供一部分啟動資金，比如提供小部分政策傾斜和資源優化配置，比如阻撓洋務派培養近代化科學技術人才等等。一些守舊大臣如倭仁（1804-1871）等，仍然自以為中國是天朝，此外都是蠻夷，他們對於一切洋務都反對、都仇視，不僅認為洋務不足以救國，甚至認為自強運動是亡國運動。如倭仁對於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的反對，「守舊之徒群起附和，以新學為詬病，而有志之士，劫於眾論，瞻顧而不敢涉足，故館雖設而不能得人材」；另一位大臣閻敬銘談到外交人才時，嘆道：「焉有正士，而屑為此者」（李定一，1974）。如此看來，新政的推行定必受到嚴重的傷害。

#### 4.1.4 國策方面

現代學者常將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一成一敗原因作比較，因為它們皆代表兩國現代化之始，有學為認為，中、日兩國現代化的起步時間相若（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兩國均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結果卻迥異。新左派<sup>40</sup>學者批評以「現代化理論」來掩飾西方帝國主義的行為的學者，他們認為：中國不能走上現代化道路，並非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受到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長期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日本從 1854 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 C. Perry，1794-1858）扣關，開啟國門後，經歷了中日戰爭（1894-1895）、日俄戰爭（1904-1905），因此逃脫被納入這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命運。搖身一變成為向外拓展疆土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結論是現代化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成

<sup>40</sup> 新左派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各國興起的左翼意識形態，他們為一系列廣泛的社會問題，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環境保護主義、女性主義、同性戀權利、性別角色和毒品政策改革進行活動。新左派是對早期著重於辯證唯物主義和社會階層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工會運動的反對性反應，及是傳統左派目標的延續和復興。

為帝國主義國家。

傳統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結論有其局限，因為它犯了用事實來解釋事實的錯誤，首先，事實的規律不能不言自明，如上文所述，主持洋務的大臣堅持中國文化較西方文化為優，結果洋務運動終歸失敗，兩者都是事實，但以「堅持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可解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便忽略了洋務運動失敗的規律，因此必須用理論來解釋事實；其次，當兩個事實或事情同時發生，我們是很難斷定彼此具有因果關係，即使事情發生有次序，也不能說先前所發生的事情是後來事情的原因，又如前所述，道光朝以後清廷國庫空虛，嗣後戰敗賠款又使財政負擔加重，是不足以解釋洋務運動失敗之原因，因為兩者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實不得而知，或許清廷財政枯竭是由於耗用大量金錢在洋務建設所致，所以當事實的因果不明，用事實來解釋事實會有模稜兩可的結果；再者，上述洋務運動所列的各種失敗原因，我們難以進行驗證，能夠驗證的先決條件是假設有可能被事實推翻（即事情之解釋應可能被事實推翻），只要這解釋不被事實推翻，事情便被解釋了，以上堅持中、西文化之優劣，國庫空虛，及守舊大臣的反對都不能被推翻，因為它們都是事實，解釋事情需要用理論來解釋，這才是科學的真諦。

## 4.2 科學理論解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一切事情的發生必有它的規律，解釋現象及行為就是找出它們背後的規律。含抽象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出事情的規律，因此解釋現象及行為前需有一理論作參照；然後作出各種假說，這些假說除必須與理論邏輯一致外，還需要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最後檢定假說是否與事實相符，若通過檢定，事情便得到了解釋。現在就來看看理

論如何解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 4.2.1 理論依據及提出假說

洋務運動是現代化過程，該運動主持者的目標是學習歐美如英、法、美等諸國的現代化，也可稱為歐美化，而歐美化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黑住真，2004），所以洋務建設是朝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步伐前進，可以肯定假如洋務運動成功，中國必可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朝著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分析洋務運動失敗原因是很合理的。

社會中之政治，經濟或文化，都是一種組織結構，以經濟組織而言，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混合型等組織。我們有這樣一個理論：不同組織的運作必須有制度來配合。制度是規範人們行為的準則，亦可作為遊戲規則，目的是使組織內的人能夠以更順暢的方式進行活動，用學術用語，是節省交易費用<sup>41</sup>。以企業組織為例，企業績效的好壞不僅依賴於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因素，而且也依賴於企業的產權安排和制度結構，好的產權安排和制度結構能使企業中的勞動力要素具有更高的積極性、技術人員更勞力地從事發明創新活動、企業家更好地搞好經營管理，從而使企業生產有更好的績效。資本主義組織產生的原因，是由於存在配合該組織運作的制度，若果找出是些什麼制度，便能夠解釋資本主義存在的原因。這就是我們使用的理論邏輯。

有了理論依據，可以天馬行空地提出假說。歷來學者對資本主義運作的制度有不同的見解，有些針對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注重法律對財產權的保障；有些針對資本主義的自由創新，注重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有些針對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注重金融商業組織的建設。凡此種種，都是資本主義運行所需要的制度，然而卻非所需要之全部。

<sup>41</sup> 交易費用是與生產費用相對的概念，凡生產活動以外所產生的費用，都屬於交易費用。引用在組織上，交易費用是組織運行的費用。

本文引用黃仁宇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或條件，包括：一、通過貸款方式活用資金及資本，使資金廣泛流通；二、存在龐大的企業，產生職業經理人；三、存在一切社會配套使企業活動的範圍超過企業所能及的界限<sup>42</sup>。根據這些資本主義特徵，以下提出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綜合模型，簡稱「夏氏綜合模型」作為理論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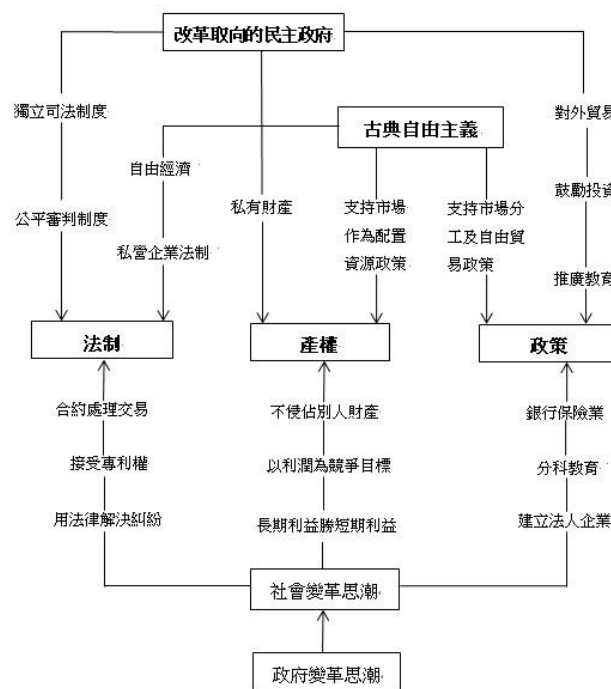


圖 3：資本主義制度綜合模型（夏氏綜合模型）

我們的模型（見圖 3）從法制、產權、及政策為基礎，分析配合資本主義的制度。這三項基礎必須有民主政府，自由思想及變革思潮的環境所推動，它們的關係如下所述：

### A. 法制

I. 一個民主政府提供一個自由的政治環境和一套開放的經濟政策，方便推行有利於現代化的法律制度。

II. 古典自由主義提供一個自由經濟及私營企業制度的體制在所制訂的法律制度下運作。

<sup>42</sup>黃仁宇著《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聯經出版股份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2月版，P.248。

III. 在政府及社會變革思潮下，民眾普遍使用法律來解決商業糾紛，商業交易使用合約來約束交易雙方的行為，專利權受到社會尊重，這樣有助加強法律的制訂及實施。

## B. 產權

I. 民主政府不會侵犯私有財產權，包括財產的使用權、收入權及轉讓權，而且還會確保人民的財產不受他人侵佔。

II. 古典自由主義支持用市場（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而市場制度的先決條件是要確立私有產權，因為缺乏私有產權，沒法激勵人們努力，市場制度也不能維持下去。

III. 社會接受了私產制度後，因應變革需要，以長期利潤為目標的企業，及尊重別人財產的情況便會扎根於社會。

## C. 政策

I. 一個由人民推選出來的民主政府，所推行的的大都是因應民眾所需要的政策。人民百姓需要的是富裕，因此便會產生有利於增進國民財富的制度，例如貿易及投資等方面；教育是對人力的投資，屬於長期的投資政策，這方面民主政府是極度重視的。

II. 古典自由主義提供分工及自由貿易理論基礎，加強深化現代化改革所推行的服務性行業的依據。

III. 在民間及政府變革思潮推動下，銀行及保險等服務性行業普遍出現，它們對資本主義商業運作有推波助瀾之功；同時專業及分科教育之出現，對培訓經濟管理、市場財務，及技術人才都有幫助；結果大型法人企業不斷湧現，現代化得以推展。

### 4.2.2 假說檢驗

這裡以十六至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對我們綜合模型之假說作事

實驗證。歐洲在十六世紀開始進入近代階段，近代的特點是各國之封建制度沒落，貴族被王權所抑制；中央集權及君主專制在各國盛行；隨著海上貿易之擴大，中產階級興起。十四世紀由義大利北部所引發的文藝復興運動，其時已席捲歐洲，文藝復興在文學、哲學、藝術、政治、科學、宗教等領域用上人文主義方法去探索知識，使知識的發展遠遠超過了中世紀，尤以科技及商貿在歐洲各國被廣泛重視。西元1500年開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貿易，特別是跨大西洋長距離貿易，是工業革命的關鍵條件之一。不過，同樣進行大西洋貿易，工業革命卻只發生在英國與荷蘭，但是卻不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發生。

西班牙及葡萄牙早於英國從事大西洋長距離航海探險，較早掌握並擁有相對優良的航海技術和經驗。可以說，這兩國是整個大西洋貿易的先行者，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主導甚至壟斷了整個大西洋貿易；而且西、葡兩國率先佔領了自然條件優於北美的南美洲，兩國比英國有更好的自然資源進行國際貿易(S. Johnson、D. Acemoglu、J. Robinson, 2005)。然而資本主義卻在十八世紀最早出現於英國，倘若上述制度綜合模型之假設成立，英國出現資本主義前，在法制、產權、與商業政策方面應有一定之基礎，現據史實作出驗證。

首先我們討論一下英國的民主政府，自由主義及社會思潮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發展。

#### A. 民主政治

1215年《大憲章》(Magna Carta)的頒布及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是英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兩個里程碑。大憲章改革了法律和司法制度，而且限制了國王及皇室官員的行為；光榮革命後由人民票選的國會成為英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國王只是國家的一



個象徵。十七世紀以後民主制度在英國正式確立起來，結果是英國議會對皇權有相當的制衡能力，王室的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企業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動註冊，從事國際貿易不需要經過國家特許，重要的是與英國王室有關係的大型貿易公司不斷減少，而大量與王室無關，沒有特權的人民從大西洋貿易中發了財。可以斷言，英國的君主立憲政制，對私人企業發展及自由經濟推動有極大作用，從而使經濟迅速增長，持續及穩步地邁向資本主義之路。

## B.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思想普遍流行於十七、八世紀的歐洲，它實受到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 Locke，1632-1704）所影響。自由主義的最大原則在於個人自由，認為人應該是自由的，其思想不應受階級，種族，教會，民族，或國家之限制；人必須自由使用理性，且在超出於自己利益、偏見或下意識的衝動來思考問題。自由主義者在宗教方面主張信仰自由，教會和教士最好少過問公共事務；政治方面認為政府應該是立憲的，權力應該有限，相信選舉和代議政治；經濟方面力主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反對用宗教及政治力量限制經濟活動。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自由貿易，以及國際經濟系統等思想，對推動資本主義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 C. 社會思潮

始於十六世紀的歐洲思潮有宗教改革及自由經濟，這裡集中討論自由經濟思潮。中世紀歐洲的商業已經有明顯發展之趨勢，由於城市的興起，大城市內形成蓬勃的商業活動，及至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參加了這多次遠征的歐洲人，他們回國後垂涎於自己在東方所見到和享受到的種種奇妙奢侈品，促使了遠洋貿易在各國之發展。當時對經濟問題的思考主要以讓·布但（J. Bodin，1530-1596）及托馬斯·孟恩（T.

Mun，1571-1641）的重商主義（**Merchantilism**）。他們認為貨幣就是財富，貨幣累積愈多，國家就愈富有，因此一國必須推動出口貿易，以此賺取更多貨幣。到十八世紀，亞當·史密斯（**A. Smith，1723-1790**）提出利己心、分工、交換是國家財富之來源，並以自由經濟理論確立了經濟學的地位。自由經濟除給人們了解致富之道外，還使人明白經濟運作並非只能靠政府推動，透過市場亦可有效地達到供、需之間的雙贏，這也是資本主義精粹所在。

自由主義及經濟思潮在十六世紀普遍存在於歐洲各國，然而民主政治除英國外，其餘的歐洲國家仍停留在王權專制階段，據此可以理解，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及社會思潮三項，缺一都不能推動資本主義的實現。現在具體指出英國在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期間所產生的制度，及其對實現資本主義的關係。

#### A. 法制

十三世紀中期英國已經出現處理商事糾紛稱作灰足法庭（**Piepowder Courts**）的司法機構，這些法庭設在各地的市集內，法庭的司法管轄範圍限於產生於市集的糾紛，包括債務、契約、侵害和違反法例的行為。

1283年通過《商人法》（**Statute of Merchants**，即 **Statute of Acton Burnell**），該法旨在為在英國從事貿易的商人提供迅捷解決爭議的個案，而且容許賣方商人在貿易地的市長面前起訴買方商人，市長通常有權出賣債務人的財產來滿足債權人的合法請求。

1303年又通過了《貿易特許狀》（**Carta Mercatoria**），承認商法構成英國法律的一部分。而且免除了外國商人繳納地方稅收的義務，允許他們在英國全境自由從事批發和出口貿易。當商事糾紛涉及到外國

商人時該法允許陪審團由一半英國人及一半該國商人的同一國籍的同胞組成。

中世紀英國商事法中最為重要的一部法例，是在 1353 年頒布，名為《貿易中心法》(Statute of the Staple)，這部法例規定在英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建立起十五個經營大宗物品的市集法庭。法庭的審理由所在地具有商法知識的市長及兩名治安官 (constables) 主持，並明確規定市集法院適用商人法而非普通法，陪審團完全由商人組成。

有了健全的商業法規及獨立審判之法院，營商者在交易上獲得保障，一方面能夠吸引大量企業在地投資，另一方面企業規模亦不斷擴大，由於大規模企業需要龐大資本，及專業的管理知識，當有管理能力的人缺少金錢，有錢的人又缺乏管理才能時，職業經理人便因而產生。

## B. 產權

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下，產權都是相對的，所有的人都依附於某個主人，任何土地都屬於某個領主，因此土地這一產權最終屬於直接使用的領主，還是屬於該領主依附的主人，便很難確定了。但這一封建關係，在英國卻是一個例外。遲至十二、三世紀之交，絕對地產權已經成為英格蘭的通則 (劉為，2012)。這種產權關係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領主無權干預。

在英國，雖然財產基本上實行長子繼承制，但無論是長子或其他兒子，都沒有天然繼承權，財產擁有者生前可以把它讓渡給教會以外的任何人，女性也可以繼承。

光榮革命後英國議會對王權有相當的制衡能力，這個初始條件對改進商業交易效率的制度變化有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在英國，限制王權、保護私有財產 (特別是對土地私有產權的保護) 以及人們

可以自由經商的權利等等，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一一實現。

英國從貿易創造出來的新富中，有許多是擁有地產的企業家。這些地主在產權獲得保護後，要麼將土地出售，要麼將土地抵押取得資金，而這些資金也就成為進一步促進投資與賺錢的資本來源。亦即，有效地保護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權，讓這些擁有土地的地主，通過信貸市場獲得企業所需資金。

### C. 政策

1694 年英倫銀行 (Bank of England) 成立，股東都是倫敦的商人，資本由他們墊給政府和在銀匠店裡的金銀及收據組成，這些資金由銀行董事會名義貸與政府，收取利息，因此英倫銀行可以發行鈔票。

十七世紀末，土地銀行 (Land Banks) 紛紛組成，地主可以在保有地產的情況下，從事商業投資。其後英格蘭及蘇格蘭的地方銀行與鄉村銀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至此不僅信用膨脹，農業與商業的隔閡更為消失，資金更能互相支持，全國結成了一個龐大的信用網。

保險業之展開稍遲於英倫銀行的成立，十七世紀末期，大量小型保險公司已經湧現。1710 年太陽火險公司 (Sun Fire Company) 開始營業，十年後，倫敦保險公司 (London Assurance) 和皇家交換保險公司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亦相繼成立，這兩家公司在 1720 年獲得了海上保險的英國皇家特許證書，壟斷了英國海上保險市場，象徵著英國金融財政組織的成熟。

十六世紀後期，英國的有識之士開始檢討當時的教育內容及形式，佛蘭西斯·培根 (F. Bacon, 1561-1626) 指出英國的學校只著重學習文字，不注重研究事物；約翰·彌爾頓 (J. Milton, 1608-1674) 更指出應該加強近代科學和實用科學的內容。

1675 年設立紐英頓學園，設有數學、自然哲學、政治科學、歷

史等課程；同年設立的格林學園，更有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自然科學、邏輯、地理等課程。

高等教育方面，在 1168 及 1209 年分別成立的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起初教學內容只有古典文科及神學，十九世紀初英國開展了「新大學運動」，1836 年倫敦大學成立，除了設有實用科學外，還開設了法律、醫學、經濟等課程。其後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均開設了這些實用課程。

銀行業提供企業的融資途徑，透過信用企業能夠籌集大量資本；保險業的出現，轉移了部分企業經營風險，增強企業主的投資信心。這兩類行業可以促進企業數量增多及規模擴大。實用科學課程的教育發展，對企業家技能培訓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金融及教育這些社會配套，使企業的活動範圍超出原來企業所應有的邊界，社會經濟因此快速增長，加快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

從上述史實得知，英國的民主政府、獨立司法制度、私有產權制度、金融機構及現代教育體制，在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已經存在，因此足以確認（confirmed）我們的綜合模型能夠解釋這些制度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

### 4.3 中國的情況

根據資本主義制度綜合模型，若要解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只要證明中國在洋務運動前不具備這些制度，資本主義便沒法在中國實現，因而洋務運動也必然失敗。現在看看中國在洋務運動前的環境。

#### A. 集權政治

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秦以後屬於君主制，沒有憲法，沒有議會，政府是經由科舉制度選拔之士人組成。唐代及以前，皇室與政府職責壁

壘分明，國家政令由宰相（政府首長）轄下的官僚負責制訂及推行，皇帝的責任只在頒布法令的詔書上畫敕而已（錢穆，1966）。明以後廢除宰相，皇帝獨攬大權，及至清雍正（1678-1735）設置軍機處，一切政由軍機處商議及頒布，絕對君主集權在清朝滅亡前都持續維持。

清代經歷康、雍兩朝的奠基，至乾隆（1711-1799）時期絕對君主專制的統治實屬超過歷朝歷代。康熙以寬政著稱，但對大小之權一人操之，不准臣下染指，他多次強調「今天下大小之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必躬自斷制，早夜焦勞而心血因之日耗也」。雍正以文字獄嚴厲打擊異己分子，對所謂功臣不惜以刀刃相加。他認為只有嚴刑峻法，才能讓臣下知所做畏。他不但操縱政柄，還提出讓大學士安樂怡養，由他代行職權。1725年雍正三年，他提出代辦大臣家事，說自己「雖日理萬機，而於大臣之家事尚能辦理」。這可算是中國獨裁政治之一絕<sup>43</sup>。

在君主集權政治下，政策之制訂全憑皇帝之喜好為依歸，不可能通過客觀討論訂出切合實際需要的政策，縱有利於百姓的資本主義制度，只要皇帝認為不當亦無法實現，就是利民善政也不能幸免。

## B. 統制思想

傳統中國將自由界定為自在、自得、自適、自樂等個人的內心感受和心態，如杜甫（712-770）詩「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張佛泉（1993）在《自由與人權》一書中將自由分為講求人權的政治自由，及道德或精神上的自由。中國人所講的自由，就是後一種自由。因此中國自始並不存在十七世紀西方所盛行的政治自由。

中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存在著一種做人的理想標準，仁、

<sup>43</sup> 引自林乾、句華著《精神放逐的年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P.197至198。

義、禮、智、信這五條做人的道德標準，約束著人的思想及行為。孔子（551 BC-479 BC）在《論語·為政篇》說：「從心所欲不逾矩」，指的是一切都能夠隨心所欲，但卻又要合乎法度，就是傳統中國所講的自由受道德精神束縛的明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在《論語·顏淵》篇中對「禮」的具體闡述，意謂人們在社會不同角色之下，應做符合角色所要求及規範的事情，讓社會各階層能安於其分，不做超越自己所在等級的事情。從這個意義看，安分及不超越卻限制了人們的自由。

滿清入關後加強對思想文化的控制，極力提倡「程朱理學」，並積極進行思想誘導，收羅了一批理學家，如魏裔介、熊賜履、李光地、魏象樞、湯斌等人，命他們編寫《朱子全書》等理學著作，將理學中忠、孝的思想加以推廣以束縛人民思想；對於一切的文字著述，只要被認為是礙於清政府統治或者觸犯科權神威的，就被視為「悖逆」和「異端」，並興大獄。

缺乏自由思想的中國傳統社會，民間因此沒法出現變革思潮，更不會產生出配合資本主義的有利制度來。

### C. 管制經濟

「有限度」是中國傳統的經濟觀，認為人生對經濟之需要而言，必須有一限度，不能有「超水準」的經濟。故談及經濟問題時，特別注重「制節謹度」，「節」與「道」是水準，「制」與「謹」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不讓經濟脫離人生之需要而放任其無限發展（錢穆，1961）。

除「有限度」外，中國的經濟思想強調平均主義。《論語·季氏》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認為缺乏金錢及貧窮都不可懼怕，分配不平均及生活不安寧才是社會所憂慮。因而歷代統治者

都以「平均地權」及「節制資本」為經濟綱領，於是均田及抑商政策常在社會上議論並被間斷地執行。

中國另一固有經濟思想是重視國營事業，這是抑商的一種手段，且能達到平抑物價之效，「均輸平準」<sup>44</sup>便是具體的方法。於是中國傳統的工商業產生了如下特點：一、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壁壘分明，前者壟斷上游資源型產業，後者控制中下游消費生產領域，使經濟出現「只有底層，沒有頂層」的奇特景象；二、政府與民間沒有形成對等的契約關係，民間資本的積累缺乏制度性保障；三、權貴資本橫行，「尋租」(rent-seeking)<sup>45</sup>現象歷代不衰，社會資產不是在生產領域積累擴大，而是在流通領域內反復分配（吳曉波，2017）。

清初三大儒仍雜染上述傳統經濟思想。顧炎武（1613-1682）主張以農富國，認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田功論》載於《顧亭林詩文集》）；黃宗羲（1610-1695）提倡均田，建議土地平均使用，其構想：「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紛紛」（《明夷待訪錄》田制三）；王夫之（1619-1692）認為商人是「貧人以自富」（《讀通鑒論》卷二《漢高祖》十四）的剝削者，「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穫之」（《讀通鑒論》卷三《漢武帝》廿七），鄙商態度可見一斑。

雖然中國商業成熟得早（見第三章第三節），但卻偏離了自由市場方向，走進畸形發展道路，與西方資本主義逐漸背道而馳。西方發展的是工業資本主義，中國所形成的是商業資本主義，嚴格而言，商

<sup>44</sup> 各地輸中央政府的物品轉運至所需物品之各處販賣，從而增加政府收入，抑制商人壟斷市場，是謂「均輸」；根據物價，貴時拋售，賤時收購。待政府所掌握的物資大大增加時，達到平抑市場物價的效果，打擊富商大賈囤積及壟斷，是謂「平準」。

<sup>45</sup> 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獨占地位，從而得到或付出金錢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



業資本主義並非資本主義<sup>46</sup>，兩者相去甚遠，因此歷來中國沒有為資本主義發展建立的制度出現。

中國在產權、法制、金融及教育建設的起步較遲，與西方相距約二百年，與洋務運動相距約二十年，由於這些制度較遲出現，古代中國自發地產生了一些替代物來配合傳統商業資本主義的運作，具體如下。

#### A. 法制

1904 年制訂的《欽定大清商律》是中國第一部商法，在之前的時間裡，只有稱為「商事規範」的法規，它是對有關商事活動及契約行為的規範。其主要精神是：以農業為社會的根本；穩定的土地財政收入乃國家財政之根本；將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之上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前提；工商業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從而造成種種社會問題；商品買賣不及經營土地有保障<sup>47</sup>。這全是重農抑商思想。

#### B. 產權

商業上保障財產權的法律稱為專利法，中國第一部專利法出現在 1944 年。在沒有保障專利權法律以前，中國農村對財產的歸屬是根據儒家觀念，一切財產都是一家之主所有，亦即家中父親，家庭之中財產的爭執，產權都是歸於父輩。至於商業上產權方面的糾紛，只根據交易前所簽之合約為依歸。

#### C. 政策

最早在中國成立的外資銀行及保險公司，分別是 1845 年在廣州成立的英資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後更名為麗如銀行），及於 1805

<sup>46</sup> 商業資本主義只重視商品交換活動，缺乏從事生產的動機。工業資本主義則兼顧生產及交換兩方面，強調兩者相互配合才能產生利潤。

<sup>47</sup> 資料來源：苗延波《中國古代商事規範的內容及其特徵》，載於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956215>

年英商在廣州成立的諫當保安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亦稱廣州保險協會或廣州保險社）。當時的外資銀行是為英國人的貿易服務<sup>48</sup>。外資保險公司只承保在華的外國僑民。真正中國人開設而為華人服務的銀行及保險公司，是 1897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及在 1875 年成立的仁和水險公司<sup>49</sup>。

中國還沒出現銀行以前，唐代的商業地區，已經出現了所謂的「櫃枋」和「飛錢」。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帖（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飛錢又叫「便換」，類似現在的匯票，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後來又出現了「錢莊」及「票號」，錢莊接受顧客現金存款，發出莊票和錢票證明。及後錢莊互聯，方便提存、信貸、抵押，異地市場因此興盛。票號也是接受存款及經營匯兌業務的組織，以山西晉商經營為主。

商人一般對資金需求十分殷切，在沒有銀行從事放款業務的年代，私人放債便十分盛行，為了防止私人放貸過於剝削，自周朝（1100 BC-256 BC）開始由泉府<sup>50</sup>經營官方放貸已成定制。放債由私人經營，由於收回債務的機率低，放款人的風險高，因此利息也很高；縱然由政府經營，也由於官僚的徇私或欺壓，借款人所需支付的也很高。漢代利息不得超過百分之百及以複利計算；唐武則天規定官貸利息不超過百分之六十，民間放貸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八；宋王安石變法規定各官府借錢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元、明，民間利息上限是百分之三十六；十九世紀清朝時，利息上限為百分之二十四<sup>51</sup>。雖然放貸利息呈下降，但也是高水平，對民間商業融資效率的影響頗巨。

<sup>48</sup> 業務側重於國際匯兌，為英國、中國、印度之間的三角貿易提供便利。

<sup>49</sup> 1886 年仁和水險公司與在 1878 年成立的濟和水火保險公司合併。

<sup>50</sup> 掌管國家稅收、收購市上的滯銷物資的官員。

<sup>51</sup> 利息數據來源：陳志武《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2020 年 2 月初版，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P.142-143。

中國首間開設西文及西藝為教學內容的學校，是 1862 年設立的北京同文館。第一所中國現代高等教會學府，在 1892 年由美國聖公會創建的上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由中國人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是 1895 年天津北洋大學堂。

古代的學校設在中央的稱「辟雍」，設於地方的稱「庠序」，所教授的不外兩類內容：「道」與「器」，用現在的話來說，前者是人文科學知識；後者是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知識。漢朝以前，學校的教學道器並重；漢以後由於文化上開始進入儒化時期，學術方面重道而不重器了；魏晉南北朝後，清談及玄學思想滲進儒家經學研究中，講道不講器的儒家南學化成為當時學術主流；自唐、宋至明經過儒、佛、道三教合流，經學家講述性命之理，在這儒家理學化時期，學校對器物的研究完全被摒棄了。

滿清入主中原，深恐專制統治不能長久維持，在學術上採用「抑其道器而揚其文詞」的政策對待漢人，認同一般篤實人士反對理學，從而引導學子專向文詞的道路發展，提倡無關道、器的考據學，並用八股文為考取科舉的標準。在儒學文詞化的清代，學子只偏重於與道器創造無關的枝節研究，純以工具為學問，缺乏偉大系統<sup>52</sup>。中國在重道輕器的文化傳統上渡過了近二千年，洋務運動前夕既沒有培訓科學人才的學校，學術上又是僵硬難懂的學問，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極不相容。

從上述史實可以清楚得知，洋務運動前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環境確實不容易培育出資本主義的幼苗，沒有排難解紛的商法，缺少促進交易的產權保護，一切推動商業運作之制度配套仍未產生，洋務

<sup>52</sup> 有關中國學術發展內容，參考羅香林《中國文化的演進》載於中國民族史，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P.52-70。

運動失敗乃屬意料中的事情。

#### 4.4 小結

洋務運動的特點是在西方經濟侵略及改革不完全的情況下展開，它的失敗卻引發往後連串之現代化改革。一般以 1860 年為洋務運動之始，1895 年甲午戰敗為其終結。歷史學者對洋務運動失敗有四項總結：缺乏長遠目標，堅持中學為體，變用而不變體；或因政府財力不繼，為建設頤和園而耗用大舉經費；加上中央威望不再，官僚對變法內容又競相爭拗；甚而說中國由於沒有發展帝國主義，因此不可能有西方現代化變革的出現。

這些分析犯了用事實解釋事實的錯誤，沒有指出現象背後的規律，若用理論來說明事情的規律，並以事實對理論所提出之假說作檢驗，所得的解釋才算得上科學。洋務運動是歐美化及資本主義化過程。組織的運作必須有規範組織內人們行為的制度配合，資本主義作為組織也需要一些制度來配合運作，根據這理論邏輯，只要驗證中國沒有存在資本主義下所需的制度，便能解釋洋務運動失敗原因。

有了理論框架，構想了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綜合模型作為理論的假說，此模型指出民主，自由及變革思潮等環境，能夠推動健全法制、私有產權、及資本主義政策等制度的產生，並根據英國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歷史，檢證了這些環境及制度對英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確有直接關係，這樣驗證了我們的假說。

相反，從歷史得知，中國在洋務運動前是政治集權，思想不自由，統制經濟的社會，商業法規、產權保障、銀行及金融等制度又不發達，因此沒有條件發展資本主義，洋務運動失敗因而順理成章。

## 第五章 總結

作為本文的總結，需要討論三個問題：一是使用分析洋務運動失敗原因的方法，具有什麼優劣之處？二是探討洋務運動是否真的失敗？從長距離看，洋務建設對中國現代化確有正面影響；三是推測中國現代化的發展。

### 5.1 本文分析方法的優劣

本文我們使用了科學方法（Methodology of Science）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科學方法分析的過程是用抽象理論來解釋現象，然後推導現象出現原因的假說，並用事實對假說進行檢驗，通過驗證的假說成為解釋現象的理論或原因。它的優點有二：

- A. 有一抽象理論作為前提框架，不致在漫無邊際的境界下進行推理，產生空洞的結論。本文將制度是規範組織內人的行為，使組織運作具有效率之理論作為前提理論，分析時有了依據，所作之假說也不致空泛。
- B. 用事實對假說作檢驗後才確定假說的有效性。傳統分析只是分析者主觀的推理結論，事情是否屬實只有天曉得，而且這些分析是用事實來解釋事實，沒法個別作檢驗，因而就沒可能錯，成了套套邏輯（Tautology）<sup>53</sup>；本文的推理經過事實驗證，有客觀事實確確鑿鑿地作證明，並非憑空杜撰。

然而科學方法亦有它的缺點，可分兩項說明：

- A. 前提理論是科學分析方法的基礎，前提理論是否對所分析的事情或現象有廣泛解釋力是很重要，假如不具廣泛解釋力，整個分析有如大廈一樣因地基不穩而倒塌。本文前提理論建基於制度與組織的關係，

<sup>53</sup> 一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或不可能被想像是錯的語句。例如「四足動物有四隻腳」。

如果組織運作與制度根本不存在關係而跟別的原因有關，那麼我們的分析將付之一炬。

B. 任何驗證結果只在當時成立，日後有可能被事實推翻。科學驗證是在檢驗一刻通過，沒法保證永遠都能成立，假如日後的事實否定了假說，原先所作的原因或解釋將會被推翻。科學結論一般不會說正確與不正確，只能說確認與不確認，因為沒有永遠正確的結論。本文引用了大量英國史料論證我們的綜合模型，假如日後發現史證實法制、產權及政策不能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那麼我們的分析將要重頭開始。

## 5.2 洋務運動失敗之商榷

本文的題目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洋務運動失敗是題目預設之命題，假若洋務運動根本沒有失敗，本文便屬多此一舉了。對於洋務運動失敗與否，若從兩方面看，即洋務建設及變革自強兩角度，會有不同的成敗結論。

洋務運動是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而作的一連串現代化變革，它具有改革及建設的精神。改革之目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設則集中在軍事及工業方面。改革方面，它於 1895 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後已證實失敗，原因是改革之目的本是要使清廷從弱轉向強大，現在跟一個同受外侮，並同時起步進行變革的國家也不敵，證明了改革還未夠徹底，在當時來說，確是一個失敗的改革。

建設方面，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之始，現代化包括多方面，政治上民主化、經濟上自動化、文化上自由化，都是現代化的內容，因此現代化是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洋務運動期間所建立的設施，甲午戰後並沒有消失，而且在日後現代化過程中起著推動作用。正如

本文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需要有配合其發展的制度存在，洋務運動的建設，如教育、工業、鐵路、金融等，都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配套，是現代化過程不能缺少的輔助物。從這個意義看，洋務運動又不是完全失敗告終。

綜合而言，稱為自強運動的洋務改革運動，在自強方面可說失敗了，至少在當時看如是，在改革方面，雖然只在個別項目上作變革，卻對整個現代化過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成是敗，只有在不同角度下討論。

### 5.3 中國現代化的展望

如前所述，洋務運動是現代化之始，它屬於經濟上的變革，繼之是辛亥革命，屬於政治上之變革，再者是五四運動的文化變革。經這三次變革，工業化、民主化、自由化都在中國出現，但卻因民國初年，政府衰弱，軍人跋扈，日本侵略，在混亂政局下，「三化」始終未能真正落實。及八年抗戰結束，國共又牽起了內戰，後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共產黨在大陸管治，中國分裂成兩個政府。然而意料之外是，中國在分裂二十多年後，現代化竟在中國土地真正實現起來。

大陸在中共統治初年不斷出現政治運動，經濟嚴重受創，百姓生活艱苦。1978 年中共在水深火熱下推行改革開放，經過四十年後，經濟上有了重大之改變。改革開放是以市場經濟為剛，引進國外投資為領，雖然中共始終不承認這是資本主義，但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國家資本主義相比，已經更接近自由市場經濟。可是中共在經濟方面的變革有餘，而政治方面改革尚未展開，因此現代化仍未完成。

在台灣，國民政府遷台後改革經濟，分別以刺激出口及增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七十年代成為經濟表現突出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1987 年後，經政治改革，取消戒嚴令，容許其它政黨活動，2000 年更打破一黨專政，首次出現政黨輪替。自始經濟、政治、社會的現代化在中國人社會裡實現。

就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展望看，在中國大陸，中共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經濟改革卻有開倒車的跡象。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從過往重視宏觀上之調控，到現在兼具微觀之監控；國營企業不但減慢私有化步伐，而且在通訊、鐵路、石油等行業加大了國家資本。國有控股企業數目，1998 年有 64,737 個，2008 年降至 21,313 個，2018 年再度降至 19,250 個，降率已大幅度下滑，到 2020 年國有控股企業回升至 22,072 個<sup>54</sup>，似有恢復建政時消除私有制之政策。

現在大陸的經濟改革站在十字路口上，前面有三條道路可供選擇，貫徹改革開放，停留不動，或重回舊路。從現代化而言，停留不動及重回舊路都並非理想，只有繼續前行，才是光明之路，然而前行需要政治改革，因為法治，民主及自由才是資本主義經濟成功之門，在目前法治不彰，政治專制，言論受限的環境下，不改變是沒法走下去的，縱然硬著走下去，終有再停下來裹足不前的一天。

在台灣，現代化雖已全面實現，但如果民進黨仍然決心「去中國化」，中華民國國號不能維持的話，由中國人組織的政府落實的現代化便無法持續，中國現代化也會成為泡影。

<sup>54</sup>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21，網上版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 參考文獻

### 1· 期刊類

- ◇ 趙善軒（2005）。天朝外交抑或平等外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5年10月號、11月號），153-157。
- ◇ 連浩鏐（2007）。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與蛻變的歷程。香港考試局新高中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歷史課程知識增益，（2007年3月版）。
- ◇ 邵維慶（2008）。現代化意義與中國現代化歷程之探討。台灣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人文及管理學報 第五期，（2008年11月），81-110。
- ◇ 李旭飛（1986）。國父革命與洪楊革命之比較研究。三民主義學報第十期，（民國75年6月），409-432。
- ◇ 高力克（2011）。孫中山的大國之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10月號、11月號），34-43。
- ◇ 吳玉山（2012）。孫中山思想、民國百年與兩岸發展模式。《政治科學叢論第52期》，（民國101年6月），1-42。
- ◇ 高力克（2009）。五四啟蒙的兩種模式——陳獨秀與杜亞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月刊》，（2009年6月

號)，18–28。

- ◇ 趙兵（2020）。全球史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評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月刊》，（2020年6月號），142–150。
- ◇ 劉為（2012）。英國憲政溯源：絕對財產權和普通法傳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月刊》，（2012年6月號），115–124。
- ◇ 黑住真（2004）。近代化經驗與東亞儒教——以日本為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12月號），21–27。

## 2· 專著類

- ◇ 王曾才（1979）。西洋近代史。正中書局印行。
- ◇ 李定一（1974）。中國近代史。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 ◇ 黃仁宇（2019）。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吳曉波（2014）。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葉龍（2013）。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 ◇ 于宗先主編（1989）。*經濟學百科全書2：經濟思想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陳雨露、楊棟（2015）。*中國金融史 3000 年（上）*。遠足文化發行。
- ◇ 黃純豔（2003）。*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 鄭海檬主編（2005）。*簡明中國經濟通史*。人民出版社。
- ◇ 劉永成（1997）。*中國租佃制度史*。文津出版社。
- ◇ 錢穆（2001）。*中國歷史精神*。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 ◇ 嚴昌洪（2007）。*20 世紀中國社會生活變遷史*。人民出版社。
- ◇ 張維迎（2012）。*市場的邏輯增訂版*。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鄭曦原（2018）。*帝國的回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 李劍農（1942）。*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 張五常（2002）。*經濟解釋卷一——科學說需求*。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 ◇ 袁慶明（2011）。*新制度經濟學教程*。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 ◇ 黃仁宇（2017）。*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錢穆（1966）。*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大中國印刷廠。

- ◇ 錢穆（2001）。*中國歷史研究法*。蘭台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 ◇ 吳曉波（2017）。*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至1869年*。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 葉世昌（2003）。*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
- ◇ 陳志武（2020）。*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 羅香林（1953）。*中國民族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 ◇ Myers, Ramon H. (1982).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3· 報紙類

- ◇ 朗天（1998-12-27）。湯因比的歷史哲學。《明報》，副刊。

### 4· 論文集

- ◇ 張錦鵬（2003）。*宋代商品供給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

### 5· 翻譯類書籍

- ◇ 伍曉鷹、許憲春、葉燕斐、施發啟（譯）（2003）。*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Angus Maddison, 2001）

### 6· 電子文獻

- ◇ 每日要聞（2019-11-18）。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洋務運動失

敗原因淺釋。

<https://looknews.cc/zh-hk/lishi/427515.html>

✧ 百聞網 (2022-1-11)。北洋水師的軍費去哪裡了？

<https://uobai.com/history/594950.html>

✧ MBA 智庫文檔 (2005)。The Rise of Europe :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https://doc.mbalib.com/view/aabb67be2665beed7e1a8da042f4f210.html>

✧ 知乎 (2021-4-11)。苗延波，中國古代商事規範的內容及其特徵，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956215>